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9月30日第18期 总第19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6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二）

目 录

【专 稿】

李豫生 中国人民大学的“七人信”

——我与人大文革

王复兴 关于舒声对《抢救记忆》一书的评论的评论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

【评 论】

胡拾音 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保王、关、戚的”就是文革思维吗？

宫香政 评毛泽东给聂元梓戴的“三顶帽子”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九）

——分庭抗礼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三）

——军宣队默许打人

【读者来信】

1. 肃水：蔡鸣乔的文章有深度

2. 宫香政：190期读后感

【本刊声明】

【专稿】

中国人民大学的“七人信”

——我与人大文革

李豫生¹

“七人信”的产生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人民大学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标题是《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 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这封信发表后被习惯性地称呼为“人民大学李豫生等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作为这封信落款中排在第一位的签署人,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这封信的发起人、组织者,亦或撰稿人,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会有外校的老五届同学向我打听此事。

我怎么会参与签署这封信?怎么会不假思索地签在了第一位?信是怎样送达的?发表后对我个人的人生轨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时隔50余年回顾历史的轨迹,真实反倒显现的更加清晰起来。

这封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语文系三年级同学刘平凡。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运动狂飙已经席卷了北京各个高校,不同观点的人自由组合,用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执笔者,也有赞同签字者,只要认为赞同、支持,经发起人认可,就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起人一般愿意吸引更多的人签署。

我和刘平凡本不熟悉,她的父亲刘志坚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副组长。因为不熟,对这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在意。但刘平凡的

¹ 本文作者李豫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69届毕业生,1966年文革时期二年级在校生。

表哥张兴孟与我同班，都是国际政治系1964级的学生，我的加入更多的应是与兴孟有关。

这封信的第一次酝酿会，就是由张兴孟同学召集，在我系宿舍（六处五排）一间乒乓球室召开的。在此之前某日，我正在校园的一条路上走，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刘平凡。她对我说了一些“干部子弟要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的話，我不免诧异，暗想：“你怎么会认识我？”

第一次酝酿时，来了几个外系同学，都不怎么熟悉，其中一个女同学是财贸系程辛联，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程坦，在“冀鲁豫”工作过，我就揣测也许是由于父辈有闻吧？那次刘平凡手里拿了一篇一张纸的小稿子，内容是当时经常宣传的要搞教育革命的事情，刘平凡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同意就由她去修改后大家签名送上去。

来的同学自然是没什么意见，支持、拥护。后来张兴孟同学还告诉我，我班团支部书记蔡金发和另一个同学曾写信给过某上级部门，要求扩大我们学生的阅读权限，这也算是来自群众的一个教改要求。

没过几天，刘平凡就拿来了正式的稿件，我感到视角权威、口吻决断，并不像是我们学生自己写的，私下以为可能是领导秘书执笔。但彼时彼刻，在大浪潮的裹挟下，几乎每个年轻的大学生心中都涌发着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向党和领袖指引的方向冲锋！支持、支持！签名、签名！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态度，拿起笔就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签名的顺序是：李豫生 张兴孟 蔡金发 程辛联 吕平 耿胜利 刘平凡。时间：1966年6月22日。我们班的三位：我、兴孟、老蔡排在了前头，刘平凡的名字签在了最后。

从此，这封信以“七人信”的简称，进入了人大的历史，进入了教育改革的历史，也进入了我们这些签名者的人生之中。

“七人信”的组织、撰写、发表都源于毛泽东

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不但从小一直接受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教育，而且从高中起更加强化：国际形势是反修防修，警惕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国内形势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断深挖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高中毕业时，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侯隽、邢燕子学习，曾经决定不考大学了，争着要到农村去，只是在老师的劝解下，才同意“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勉强走进了大学校门。

至于所选专业，也是在“先知先觉”同学的影响下，要站在“反修防修”的前哨。据说我们这届“国际政治系共运史专业”学生是要为继续写作“九评”储备资料人才，为的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百年论战下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积极参与签署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发自内心，势在必行。

至于因为与刘平凡是间接同学，无意间踏入了一个可以下达上传的渠道，那又是一种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偶然，影响和决定了我在文革之中及之后的人生轨迹。

20天后，我们这封信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天学校就召开了庆祝大会，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坐，并被当做七同学的代表发言、接受采访。事态的轰动效应使自己猝不及防、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应对得当。没有人来询问过程，关心的只是发自群众，上下呼应，推波造势。各种“革命辞藻”已经烂熟于心，只需再次鼓吹一番。

一天下来，问题发生了：刘平凡找到我，叫我立即到她家里去一趟。我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刘平凡的家，刘平凡严肃批评我的自由行动。她正告我，说我无权代表“七个人一封信”，无权随意发表意见。今后有关“七人信”事宜，我要向她汇报、听她指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有所失当。但年轻气盛的我一向有点儿我行我素，当下心有不服，想“签不签字是我个人意志，听不听你指挥也是我个人意志。”不以为然地走了。

此后不久，刘平凡就联合其他一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想，如果那次不闹翻，她也许会游说我来参加，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参加，因为彼此观点对立，在对待校长郭影秋的问题上，我保她反。即便那次不反目，以后还是会

分道扬镳。

2017年4月，我去福建看望朋友，顺便探访了久不联系的老同学蔡金发，聊起了“七人信”这个几十年不曾直面的话题。作为这封信的签署人之一，在他以后的人生起落中也曾是一个引起质疑的问题。

蔡金发后来在福建省委党校工作，按相关规定，对干部提职使用时，组织会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审查。为此，审查人员曾经走访刘平凡。审查人员向刘平凡询问的一个重点是：“‘七人信’与江青有无关系？”而刘平凡的回答则很明确：“‘七人信’就是主席的杭州会议讲话精神。”

蔡同学的告知对我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使我方才看清自己当年的懵懂幼稚。这封信的组织、撰写、发表都来源于“最高指示”，“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什么革命小将的自发行动，而是最高领袖的意思；冲昏头脑的“革命豪情”不过是提线木偶的前台表演罢了。

毛泽东要进行教育革命

应该说明的是，一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直是想紧跟伟大领袖步伐的，他们曾通过自己的子女在北京各高校对运动推波助澜，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参与推动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巨澜中，自己很快也变成了绊脚石、革命对象。

刘平凡的父亲刘志坚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军队的代表，作为老师们意见的代表在军队文革、军事院校文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很快与江青、康生一伙发生了尖锐冲突。

1967年1月3日始，首都“红卫兵”掀起了揪斗陈毅的狂潮。是日晚，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要求中央文革同意召开批陈大会。刘志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出面劝导，未能说服学生。

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时，康生发难，把矛头引向

刘志坚。他拍着桌子厉声大喝：“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学生代表立刻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变成了打斗会。

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交出刘志坚。刘志坚到场以后立即陷入重围。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就被造反派关押。此后大会批、小会斗，刘志坚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最后在陈伯达的直接揭发下，被定为“叛徒”，开始了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

刘平凡所说毛泽东1966年在杭州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

实际上，要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大搞文化革命的想法早就在伟大领袖的心中筹谋多年。对知识分子、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感、鄙视、一定要彻底砸烂的决心早就在多次讲话中发表、重申。他不止一次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曾极端地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最近又读到了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文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

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四书五经，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没有。

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

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

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 山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本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伟大领袖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1966 年 4 月 12 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 168 号上。这期摘要刊登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当时没有印发，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看到、了解和必须执行的，于是伟大领袖的教导化作了革命小将的行动。

“七人信”：革命小将的自戕

下面重温一下充满了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七个人的一封信”——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们听完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您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这些革命小将们说出了我们几年来憋在心里想说的话，说出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心愿，它长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多少年来，您每次对教育工作的指示都讲到了我们的心眼里，可那些“权威”老爷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条条框框对抗这些指示。他们上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不听取群众的呼声，他们阴险的目的就是妄想让我们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今天，我们要正告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你们的黄粱美梦永远也不会实现！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听！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执行！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在革命的炮火中诞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前进的革命青年。有人说我们整天充满了火药味。对！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按照您的指示，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向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猛烈开火！

我们认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罪状累累，必须缩短！

其罪状如下：

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

二、扩大三大差别，为资产阶级传子续孙。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唯恐青年在校时间太短，唯恐读的本本太少，唯恐受资产阶级影响不深，唯恐他们成不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三、现行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从八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二十

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十七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五、现在在校的学生是：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大米白面，读古洋“名著”，灌的名利思想，想的个人成名成家，走的白专道路。长此下去，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弟怎么会不忘本呢？

六、拚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七、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教师在那里进行无聊的考证，填鸭式的灌注，学生则整天、整月、整年埋在故纸堆里，其后果是弄得青年们晕头转向，体弱多病。

八、国家急需人材，学生迟迟不能走出校门。由于学制太长，学校的周转率极低，既不能尽快满足国家的需要；又不能使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复员军人入学。

九、浪费师资，浪费人力。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半，那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

十、由于长期脱离实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学生在学校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改也不好改，结果国家花费那么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学生远不如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生产斗争或实际工作锻炼过的基层干部；更不如那些只读过几天书，甚至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革命老前辈；更不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陈永贵、王铁人、李素文等先进人物。可见，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学校里培养的，真正的英雄不能在学校里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凡文科大学读过两年以上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

二、文科大学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三、今后文科大学学制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家的需要，改为一年、二年、三年，而且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军事和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

四、教学方法应以自学、讨论为主，教师适当辅导，发扬民主教学，走群众路线，坚决废除灌注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五、今后大学应招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锻炼、政治思想进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使那些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能够入学。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人民用大米白面养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怎么能还犹豫等待呢？既然革命的小将们敢于砸烂旧的升学制度，我们就应有勇气冲破旧的学制的束缚，采取提前毕业的革命行动！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教导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多少事，从来急”，应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英雄气概。我们多么渴望您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啊！等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走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去摔打，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改造，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补课，请他们发给“思想毕业证书”。把大学的位置让给那些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的、真正优秀的革命青年，入学深造。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必将把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埋葬！一个共产主义的、完全崭新的教育制度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在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后，再一次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会象革命前辈一样坚决革命，为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冲锋陷阵，为保卫毛泽东思想奋斗终生，使中国永不变色！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大学

李豫生 张兴孟 蔡金发 程辛联

吕平 耿胜利 刘平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今天重读这封信真是“恍如隔世”。当年“汗牛充栋”的大字报已不见踪影，大字报中那类热昏的语式也已沦为笑柄，然而有如“七个人一封信”一样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却以它的白纸黑字成为抹不去的历史印痕，给我们永远的警醒。印证着从小接受的“政治教育”，树立的学习榜样，像毒药、像致幻剂，足以致人疯狂。

“七人信”的开首提到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相关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信的内容是“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的信是“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通知，宣布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高考制度从此被废，这一废就是十年。

由此开始，高考被砸烂了，高等教育招生停止了。所有教育机构——大、中、小学统统砸烂了、荡平了。随后，按照革命小将的自觉要求，中小学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去，未修满学业的大学生一律到基层工矿农村、部队农场去。

当我们在无数回忆录中看到对知识青年苦难、老五届大学生不公平待遇的控诉时，没有想到“一个旧世界”正是假我们这一代“革命小将”之手，轰轰烈烈地摧毁的！“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荡涤掉的正是这一代革命小将受教育的机会。

一切并非历史的吊诡，事实是，伟大领袖的“挥手”没有亿万群众的“前进”是不能完成的，一群被煽动起来的疯子在砸烂一切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也连同一切一起被砸烂了！

江青的北大讲话与人大的批斗校系领导

1966年7月25日、26日，是著名的中央文革去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撤销新市委的数万人大会。26日那天，我也跟着同学在北大看大字报。那天的经历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惊心动魄。

26日下午，大约两三点钟，不知道是听了什么人招呼，我来到了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大教室，里面聚集了大约有三四百人。一会儿一个中高个、身材偏胖的女同学上台讲话了，有人窃窃私语，说这是“邵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邵华发表了鼓动性很强的讲话，大意是“革命形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一伙反革命分子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夺共产党的权。我们干部子弟要挺身而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注意保护好广播室、档案室等各个要害部门。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搏斗！”

有关这次神秘的动员，我以后从未再听别人提起过。当时的反应是“懵圈”，精神高度紧张，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继续在校园里溜达，等待大事的发生。晚上所有人都涌到了北大的一个大操场，听取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人山人海，后来有人说约两万人。我们挤在后面的山坡上，虽然远但还看得清楚。

近晚上11点钟的时候，人群轰动起来，江青出来了，她从台后面的坐席站起来走到前台，因为下着小雨，由李纳给她撑着伞挡雨。江青讲着讲着，突然提高了嗓门，她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她说：“阶级斗争到处都有，我们家里也有，毛主席家里也有。有人说，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不承认！！”好像还重复了一遍“我不承认！！”

这句话的效果非常强烈，听着的感觉像电影音效中的延时处理一样，炸得人脑子轰轰作响。真出大事了！联想到下午刚听到的邵华的总动员，真是无所适从，莫非毛主席家里的人也打起来了不成？

乱哄哄地散了会、乱哄哄地跟着人流飞奔回校。跑到学校门口，大门早已关闭，毫不犹豫地翻墙而入，一直跑到文化广场。那里，已经挤满了全校各系的学生。台上已经开始了对各系领导的批斗。

一些反应快、跑的快的学生已经紧跟毛主席司令部的指示抢先赶回学校，冲到校系领导家里，把他们控制起来，扭送到文化广场，排着队准备挨个批斗！台前还拉起了大幅标语“踢开工作组 自己闹革命”。

我在混乱中找到了本系同学集中的地方，不知情况将如何发展。不一会儿传来了要各系派代表上台议事的消息，因为“七人信”的缘故，我被推举为国际政治系的代表。上台以后，全校12个系的12名代表在靠近天幕处围成一小圈，紧张地讨论起来。大家一边讨论，一边不约而同地望着台口，那边还在继续上演批斗的惨剧。

所谓的走资派一个个被揪到话筒面前，被逼着承认自己的“三反”罪行。造反派学生扭住他们的胳膊、按下他们的脑袋，说一句要他们学一句，“说！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肯低头的“走资派”算过堂通过，在群众高呼“打倒三反分子×××”口号声中被押下台去。不肯认罪的学校领导则遭了殃，不低头就拳脚相加，有的被踢倒跪在地上，有的额头上撞出血来……

情势十分危急。我心里飞速盘算着解决的办法。抬头看看，心照不宣，我从大家的眼睛里读出了一致——“不能再继续下去，会出人命！必须停止！必须疏散！”我心里拿定了主意，对大家说：“大家下去，到各系整顿好队伍，听我到台前指挥。”代表们同意，下去集合队伍去了。

我走到台前，站到麦克风后面大声要求大家安静。我先大赞了一通“革命形势好得很，革命行动好得很”，所谓充分肯定群众的革命热情，总不能同中央文革对着干吧？然后话锋一转说“为了把对走资派的斗争深入下去，我们应该把他们押回各系，进行更深入的揭发、批判、斗争！”

“各系听我指挥，西六系在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系、××系……排好队伍。

东六系在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排好队伍，接在西六系的后面……大家绕校内游行一周，然后把走资派带回本系深入批判！”

也许因为那时那刻，在所有的权威都一扫而光的情况下，我这个不几天前刚刚因“七人信”被大家所认识的新面孔竟然有了权威性。台上乱哄哄地批斗暂告中止。所有的人服从了我的指挥，在绕校游行一周以后，大部散去，那一天总算没有在现场闹出更大的乱子。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在大混乱中自己做得比较好、比较对的一件事。我想这是人性使然、良知使然、父母所给予的正确教育使然。

人大校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没过几天，那天同在台上的经济系学生代表余景清找到我，说12系的学生代表要开一个会，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我就跟着去了。成立“筹委会”是根据7月26日晚陈伯达在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的讲话精神，他说：“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陈伯达“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人大当时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就是为以后选举出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做准备。筹委会的实际主持者是吴老的秘书王宗伯。名义上余景清是筹委会主任，王宗伯和我是副主任。筹委会也没有开过什么会，通常是接到王宗伯的通知大家就去碰头。王宗伯根据吴老的指示安排一些事情，余景清给大家做分工，再由大家分头去办。

只记得筹委会历史系的代表是万德琦，我跟他原来就很熟悉。另外还有我们系四年级的同学伍连连，她是筹委会的干事，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筹委会法律系的代表是江春

泽，她是筹委会中唯一的反郭派，非常孤立。

由于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保郭派，筹委会的成员除江春泽以外也都是保郭派，但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得打击造反派的大形势下，我们觉得作为学校的临时管理机构，也不应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筹委会采取了“伪装中立”的立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出一视同仁的姿态，在这个原则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组织了人大关于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人大“八一八红卫兵”成立，除原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外，各类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他们各自为政，校“筹委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当天会后，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知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开始明朗。

但是，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许多负责同志仍对之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自八一八以后毛又多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10月1日《红旗》第13期社论根据林彪当天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反复酌定后公开提出的。此后更逐渐明确，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人大筹委会由于明显的保守倾向，当然地成为人民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红旗》杂志社论一出，我们筹委会的几个同学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三十六计走为上”，当即决定和其他红卫兵小将一样，步行串联去！于是我、余景清、伍连连、万德琦还有另一名同学，在10月初的一个清晨，出人大西门，一路向西，向延安进发了。

2017年6月4日

【专 稿】

关于舒声对《抢救记忆》一书的评论的评论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

王复兴

本文目录：

1. 关于北大 1967 年分裂的原因
2. 关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
3. 关于周培源
4. 关于新北大反左
5. 关于保卫组整黑材料问题
6. 关于聂元梓遇刺
7. 关于周一良和高海林的和解
8. 关于牛辉林
9. 关于乔冠华为王福时写的证明
10. 几个小问题

《记忆》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第 190 期刊登了北大校友舒声的《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一文。笔者首先感谢舒声校友对拙作的全面评价及校对、指误。舒声此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许多方面，笔者对舒文的许多观点和所述史实不能完全认同，本文仅就舒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与舒声商榷并阐述如下：

一、关于北大 1967 年分裂的原因

北大为什么在1967年分裂成两大派？舒声认为：“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舒认为，北大分裂的内因仅仅是因为聂元梓单方面地压制了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说“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使“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包括他自己。

舒声在这里谈“哲学常识”，谈“内因”。但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是指事物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北大矛盾的另一方，即从“新北大”分裂出去的师生是什么状态？有什么问题？舒避而不谈。舒文只谈了矛盾一方（聂元梓、校文革），这就不够公正、客观、全面，也不符合他的“哲学常识”。从1967年6月至8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红、团、零、飘”及后来由他们统一起来而成立的“井冈山兵团”，其公开的主流口号是：“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砸烂校文革！”“摧垮老保新北大公社！”“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这些口号被他们以大标语和大字报形式张贴于满校园，并被他们的广播台经常高喊。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井、红、团、零、飘”做了一系列过激的事情，例如：1967年7月10日，曾发生“团、零、飘”冲击校文革广播大会，围攻、殴打孙蓬一的事件；7月10日，“团、零、飘”打砸抢、查封北大“保卫组”事件；7月初，笔者在办公楼主持“公社66串连会”的形势讨论会，被牛辉林带领“红旗飘”冲击会场，把笔者推下主席台，牛还对着笔者胸口踹了一脚；8月24日，“井冈山”绑架、殴打“北大保卫组”组长谢甲林至伤残，使谢患严重脑震荡；12月30日，“井冈山”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崑（前北大教务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1968年1月16日晚，“新北大公社”邀请西藏“大联指”来北大文艺演出，两派师生坐满大礼堂，“井冈山”武斗队却抢走大喇叭，打砸校文革办公室，但“公社”迅速维持好秩序，恢复了演出。以上一系列事件已超过了“文斗”的范围，对后来从1968年3月开始的两派大规模武斗起了“拱火”的酝酿作用，对推动派斗走向大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井冈山公

社、东方红公社（简称团、零、飘、井、红）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在与彭真、陆平黑帮的搏斗中，在与张承先反革命工作组的搏斗中，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搏斗中冲杀出来的！新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老同志把新北大公社作为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他们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一泻千里，不可抗御！……试看来日之环球，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试看来日之北大，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北大！”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陆平、彭佩云！”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上“井冈山”的成立《宣言》不但表达了他们的极左纲领，也反映出一种狂热的“革命豪情”。很明显“井冈山”的一些师生当时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充满马列毛之暴力革命的激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视为阶级敌人，视为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夺权”。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着敌我矛盾来对待的思想、行为，这种在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思维模式，这种不断造反、不断革命，不断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不断夺取政权的行为，是不是北大分裂的重要“内因”之一？当然是！

实际上，当年北大两派师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断革命”、“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思想。当时两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相同旗帜下，开展着激烈的内斗。只不过是“井冈山”比“公社”更左，因此“公社”被“井冈山”骂为“老保”。时至今日，舒声仍站在派性的立场上，把“井冈山”一派描绘成正义、革命的一派，罪责全是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群众的，这能说是客观、公正、全面的吗？符合历史事实吗？难道不应自省吗？舒声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有一特点，从未不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批评本派头头的错误，一味指责对方，这难道不是文革派性思维的特点吗？

其实当年“井冈山”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井冈山”的核心人物之一郭罗基老师近年

对笔者说，他当年并“不同意‘井、红’要打倒聂元梓”，“要打倒别人，结果自己被打倒。”而他“始终是坚持要给聂元梓整风”。后来两派内斗越演越烈，他也不可能控制“井冈山”的大局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笔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聂、孙、校文革、“公社总部”对北大分裂应负的责任。1967年3月郭罗基贴出给聂元梓整风的大字报后，聂、孙、校文革及“公社”“联战派”对郭罗基、零派（北京公社）群众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这是6月5日后北大分裂的内因之一。内因包括矛盾双方的原因。

舒文说：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144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舒否认陈伯达6.5讲话对北大分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舒声此言差矣！先来看看事实，看看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了什么？讲完发生了什么？

6月5日清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笔者本人的记忆，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6.5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另一次是6.5深夜在人大大会堂。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事与尘埃》中的《九十回眸》第272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6.5”讲话。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午大棒，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6.5”两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攻势。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

6月5日以后，紧接着三天：6日、7日、8日发生了什麼？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注：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注：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干是化学系0363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0”派人数较多，约有1000人左右。舒声是“0”派。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樊立勤）和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仅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成立时人数极少，影响很小，但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

陈伯达6.5讲话后，紧接着三天，从新北大分裂出人数较多三个反对派组织，舒声怎样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表明，笔者并没有“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反而舒声不知为什么要极力回避陈伯达6.5讲话对北大分裂的决定性作用。舒说“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

派也是要分裂的。”这是脱离事实的猜测。

舒声讲“哲学”，说陈6.5讲话是“外因”，只起次要作用。但“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决定性作用。正如水的结冰虽然与水的分子结构、水的性质有关，但只有当外部条件（温度）到了摄氏0度，水才会变成冰。这时，外部条件0度便起了决定性作用。再如，文革时期1966年10月至12月的全国各地的造反大潮，其发生、发展固然与各地官民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有关，与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抓右派有关，但没有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没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外因”，便不会形成全国各地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在1967年的北大，没有陈伯达的6.5讲话，北大便不会大分裂，便不会形成两大派，便不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直至武斗。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之原因，总体上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但这种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同任何矛盾的对立面一样，内因和外因作为决定事物变化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其主次地位也是互相转化的。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内因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当着缺乏一定的外部条件，内在根据所包含的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不能变为现实性的时候，外部条件的创造就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了。舒声否认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是僵化的哲学观点，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常识。1967年6月5日后北大的大分裂，决定性的因素是陈伯达的“6.5讲话”。

二、关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

“新北大”的分裂，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关系极大，有必要进行回顾。哲学系左派是指文革前夕在社教中哲学系给陆平党委积极提意见的那些干部、党员、教师，后来这批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中被重点整肃。文革中北大师生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们为“哲学系左派”。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就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对北大的运动影响很大。这是北大文革运动有别于清华等高校的一个重要特点。

舒声认为北大分裂与聂元梓对孔繁、杨克明的排斥有关。舒文说，聂“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舒的此一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哲学左派的分裂与康生插手北大运动有直接关系。2017年1月21日，在一次北大校友的聚会，李清崑说，“文革前和文革后，我和孔繁关系都很好。文革后孔繁对我说，‘哲学系左派的分裂，杨克明另搞一套，张恩慈起了很坏的作用。’张恩慈与曹轶欧近，张恩慈的所作所为与康生、曹轶欧对北大运动的看法与作法有关。”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中（香港的《北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5月第三版）第394页指出：“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张恩慈把以上中央对北大运动的分歧，告知了杨克明，引起杨克明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功劳最大，于是争功。当时因孔繁是校文革副主任，聂元梓无法安排杨克明任副主任，只安排了杨克明负责《新北大》校刊这项重要工作。但杨克明认为自己没能在校文革任要职，是聂排挤他，于是走上反聂、反校文革之路。舒声被派性模糊了双眼，凭主观想象，妄断是非，把以上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1966年6月1日以后，由于第一张大字报被毛主席高度赞誉，并在全国广播，杨克明强调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但在5月25日至31日这期间，当陆平组织北大师生围剿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面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的巨大压力时，杨克明却是另一种表现。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141页，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写到5月25日晚上的情景：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大字报贴出后的混乱情况，又害怕又着急，他的态度

改变了。”

“杨克明要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张恩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二十二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祇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张恩慈来了以后，杨克明又对他发火了，他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

2017年1月21日在北京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高云鹏说：“5.25大字报贴出后，压力很大，杨克明见到我，质问、埋怨我，说我代他在大字报上签名，为什么不通知他。我说，‘你不在，我想大字报是你写的，就代你签名了。如你不同意，我可以发表声明，说是我代你签的，你不同意，责任由我负。’杨克明没说什么就走了。”

杨克明在6.1之前的以上表现与他后来闹分裂，在思想意识上是有内在关联的。

哲学系左派的分裂对1966年10月北大群众第一次分裂起了重大作用。王任重插手北大运动是导至第一次分裂的另一重大因素。当时王任重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负责北京高校的运动。据北大保卫组谢甲林回忆，10月初时，杨克明找谢甲林谈话，说王任重指示北大组建党组，孔繁任第一把手，杨克明任第二把手。杨克明这是在对老同志分别打招呼，应是对此重建北大党组的王任重方案欣然接受。事后，谢甲林感到此方案不妥，担心引起左派分裂，于是按自己所在的组织系统向高检院副检查长黄火星做了汇报，希望领导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黄副检查长是否向中央做了汇报，谢不得而知，但他一直担心。谢甲林说，“果然不出所料”，此事后来“引起造反派分化。”（摘引自《谢甲林法学文集》第二部分32至51页）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主编2008年版）证实了谢甲林以上的回忆。1966年10月的条目中写道：“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在‘老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北大各造反派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当时大部分学生包括笔者并不知道以

上组建党组的矛盾。最近看到这一新的史料，认为对于研究北大群众第一次分裂应很重要。

三、关于周培源

舒声在文中说，“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舒在文中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周什么时间被校文革打成了“美国特务”？谁设立了周的专案？凭什么说校文革企图对周抄家抓捕？舒没有举出任何确凿证据。

事实与舒之言正好相反。《华夏文摘增刊》第1078期（2017年5月1日）刊登了文革时期北大校文革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的文章《评舒声和郑实谎言》。该文对周培源自始至终受到校文革保卫组的保护有详细的回顾。谢文指出：

1966年6月22日，我（注：指谢甲林本人——本文作者）到北大工作组报到。……让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蔡润田是海军保卫部副部长，组员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干部。在燕南园63号和66号办公、住宿，主要承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来北大时的安全；周总理确定的6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安全；北大师生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到北大看大字报和大串连的人身安全；维护北大的治安，保护北大财产的安全；自行或协助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上报和侦破反革命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和自杀案件的勘查、处理工作。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在大会上，聂元梓请求，中央文革批准，万人大会通过，宣布留下二组原班人马，继续承担北大的安全保卫工作。校文革成立后，二组改称保卫组，由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白晨曦主管，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海军人员于1966年12月撤离北大。……白晨曦让我接任组长，从法律、哲学、中文等系选调九名学生、教

员、干部，重建保卫组。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校文革及其所属组室全部停止活动，独留保卫组继续工作，仍然让我任组长，接受宣传队指挥部领导……经谢富治批准，1969年1月24日我离开北大回到高检院。

谢文又说：“文革”刚开始，北京卫戍区通知北大工作组：周总理指示，北大的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要北大做好他们的保护工作。为此，二组（保卫组）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给每人每户参照军队的做法结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警卫档案，写明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人口情况，四方邻居，从事职业；二、副组长陪同组长挨户走访，向对方说明他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告知保卫组的住址、电话和联系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情况，随时向我们反映；三、编绘了每人每户的平面图，选定了巡逻路线和放哨地点等；四、安排了24小时轮流值班，电话记录和每人每户的具体保护人员。在工作组和校文革时期，六名重点保护对象和家庭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谢文还谈到：

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63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他们对周培源说：“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不光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还整了您的黑材料。”周培源说：“他们是特务机构，就应当砸烂。”接着，牛辉林等一些人在大饭厅举办“黑材料”展览，我亲自去看了这个“展览”。所谓抄出的由二组整的“黑材料”，其中之一，是工作组二组时期给六名（周培源、翦伯赞、

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的警卫档案，其中第一卷是周培源的警卫档案。为此，我带领保卫组分管警卫工作的周俊业和分管办案工作的蓝绍江以及协助警卫、办案工作的校卫队干部肖祖德，亲自到周培源家，予以澄清。我们当面对他说，我们都参观了“黑材料”展览，牛辉林等人告诉您所谓“黑二组”整了您的“黑材料”，是工作组二组为您建立的警卫档案，当时二组组长蔡润田和副组长谢甲林亲自到您家访问过，已明确向您告知：您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并把二组的住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写在一张纸上给您了。以后，又把对您的保护工作，在档案中作了记录。现在，您竟说“保卫组是个特务机构，应当彻底砸烂”这样的话，这是有失身份的，望您检讨、道歉。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您了。

1967年8月17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五个反校文革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出席成立大会讲话，出任核心组组长，牛辉林等四人任副组长。从此，周培源离开家，住进28斋兵团总部，保卫组就无法对他实施保护了。8月24日，我被井冈山兵团绑架毒打致伤，保卫组停止了工作。后经校文革、北京市卫戍区、公安局请示，谢富治批准：“同意恢复工作，材料也应交回。”为了继续做好周总理指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我把周培源上山担任井冈山兵团领导和已离开家入住28斋总部的情况，通过卫戍区上报给周总理。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接着，北京卫戍区通知保卫组转告周培源，说：“李钟奇要给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把他送到卫戍区。”我亲自到28斋井冈山总部找周培源，被堵在门外，不让进去。我又到他家谈明情况，询问他在井冈山总部的电话号码，他妻子不愿告知，最后，我请他妻子给周培源打电话，要他给保卫组回电话，并告知了电话号码。第二天，通过电话告诉周培源说：“李钟奇要你到卫戍区给你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没有拒绝，但是，担心交通、安全问题。我说：“请您放心，给您派专车，保证您往返安全。”

周培源同意后，我对他又说：“明天上午9时，我和专车在28斋东门前30米处路上等您，您从28斋的窗户上看到时，我们俩人相互招手示意，我就到门口接您，把您送上专车，我会告诉司机蔡师傅，事关重大，往返务必保证安全……”不到中午，周培源安全回到北大，又进入28斋井冈山总部，我们保卫组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培源从北京卫戍区返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内部串连会，让周培源介绍李钟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周培源从井冈山总部回家居住后，我曾亲自登门访问过，他对牛辉林、井冈山等打、砸、抢、抄保卫组，绑架并毒打我的行为，主动认错、赔礼道歉。我对他说，按照周总理关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指示，我们将继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他和家人的警卫工作，再次告诉其保卫组的电话，有关人员、财产和其他安全问题，随时联系，保卫组一定做到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安全服务。他深受感动，一再赔礼道歉。

以上，谢甲林对校文革保卫组保护周培源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顾。

在打派仗时，“公社”方面个别人写大字报，造谣、诬蔑、攻击周培源是“周白毛”、“美国特务”，这是极端错误的，但与聂元梓、校文革是无关的，与保卫组更无关。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很混乱，群众并不是百分之百与本派领导保持一致。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周总理明确指示周培源应“下山”，退出“井冈山”，应“支左不支派”。总理批评周培源应“不支派”。周培源当年不仅“支一派”，而且参加一派，参加打派仗。周培源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错误行为。周总理批评并纠正了周培源这种不恰当的错误。

谢甲林并不是校文革委员，保卫组业务上受公安部系统领导，规定他们不参加学校运动。文革期间，谢的人事关系始终在高检院。因此谢做为以上所述史实的直接当事人，其所述史料比其他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之说，更具客观性和可信性。

四、关于新北大的反左

舒声否认北大文革中曾存在过反左的倾向和潮流，他在评《抢救记忆》一文中说：

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130页）。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1页）更是罔顾事实，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事实上聂、孙和校文革在反“走资派”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

我仍然坚持上述观点和史实。因为这是历史事实。笔者仍旧认为，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聂的“最大错误”，但笔者并没有否认聂元梓、校文革在1967年1月以后仍犯有其他错误，舒声曲解笔者为：“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白纸黑字在这里，舒声怎可任意歪曲？笔者并不否认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在1967年以后曾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批判“走资派”，校刊《新北大》曾刊登过“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但必须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环

境，须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的1967年，全国人民狂热崇拜毛泽东，全国上下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大气候、大潮流。北大两派师生，包括聂、孙，也包括舒声，都只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打“走资派”，否则就是立场错误，“大逆不道”，甚至会粉身碎骨。问题的关键点是，是否早在1967年，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曾经有过鲜明的反左倾向、反左潮流？历史的事实是：它确实发生过！存在过！这即是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当年的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左，不仅是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也是他们行动中的用力点，这样做在当时是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人们非常注意策略和隐蔽性。人们在文革中的觉醒有个过程。早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此一在北大文革中出现的闪亮的历史正能量，难道不应把它挖掘出来，做为益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展史的健康因素，予以认真总结吗？

应该如何历史主义地看待北大文革史中聂元梓的反左？王若水的分析很中肯，王若水在《聂元梓回忆录》的《序言》中指出：“聶元梓在‘文革’期間採取了抵制和反對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立場。她作為一個有政治經驗的老幹部對當時許多問題有自己的考慮，而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是和那些單純的、狂熱的紅衛兵不同的。儘管如此，她卻不能擺脫當時流行的對毛澤東的盲目的個人崇拜，不能不追隨毛澤東參加“造反”。這是很自然的，不過到了後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擺脫卻身不由己了。”

关于聂元梓、新北大反左的史实，笔者在此处提出一个重要的证据：江青于1968年初，多次批评聂元梓：“我让你反右，你偏要反左！”

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要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3.22”林彪、江青的讲话。（2015年4月笔者在北京与马云龙当面核对了江青在此会议讲的这句话。马说江青确实讲了这句话。）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反

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状》）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一定的自觉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暗指林杰、关锋是吴传启后台。

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也认识不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是毛。

当年新北大、聂、孙反左，集中表现在反吴传启，反王、关上。而舒声否认这点。舒在文中写道：“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关锋等，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关锋，就是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极左路线。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舒声说新北大、聂、孙反王、关只是逻辑推理，不对，这首先是个历史事实。而逻辑上，当时不可能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关锋，因此新北大、聂、孙的策略就是公开地打击王、关的马前卒吴传启，以此来抵制其后台王力、关锋。但这并等于主观上反中央文革、反江青（舒曲解笔者说“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笔者从未这样讲过），反而当时“公社”总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中央文革”，但客观上是反了中央文革路线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看看1967年3月下旬、4

月10日、5月28日、6月1日、6月5日，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4月10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5月28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这次“5.28”谈话十分重要，有几点值得注意：1、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2、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3、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4、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6月1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四天前，陈伯达刚刚于5月28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一次是6月5日晚至6日凌晨在人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陈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

在6月5日晚上陈伯达于人大会堂讲话之前，在6月5日清晨，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回忆说：“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五、十六章中，引自博讯文坛，编者谢冀亮）。

舒声认为“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吴传启不等于反王力、关锋。新北大反吴传启与反王、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搞形左实右，得到了王、关、戚、谢富治的支持。而聂、孙、“新北大公社”反对吴传启搞形左实右，也就打击了吴的后台王、关、戚、谢，并且会自然上升到直接反王、关、戚、谢。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并已被大量史料所证实。

新北大聂、孙派与学部联队吴传启派之间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笔者在下面择要捋一下：

1967年1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红旗》的林杰、学部联队的吴传启、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因此遭到聂元梓、新北大坚决反对。而后王力、关锋严厉批评了新北大，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撤出了高教部。

1月15日，学部民研所的洪涛、刘郢在学部潘、吴支持下，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档案抢劫一空，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刘郢等人扭送公安部，洪、刘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并发表讲话封抢档案的人是左派，反过来把反洪涛打、砸、抢的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从此，民院“抗大

公社”、郑仲兵与聂、孙、“新北大公社成为反吴传启的坚定战友，并都对谢富治不满。

4月8日，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地院“东方红”等高校的地派，在学部吴传启、洪涛等人支持下，于8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对“新北大公社”学生实行武力清场，于9日凌晨3:30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

4月11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闯入北大，大喇叭高喊：“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后来外校地派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变哑吧了，并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

“4.8”、“4.11”事件表明，由于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对学部联队潘、吴一派到处伸手抢权，搞打、砸、抢，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反新北大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谢。

以上通过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4.12”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4.11”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师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

“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杭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梓的行动。其实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

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两派，是派中之派，一派是学部联队、一派是新北大（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小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当时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派在1967年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于是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凌晨与深夜，两次针对北大讲话。6月5日之后，北大“井冈山”一派出世。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主要是在校外，而不是针对校内，是层层向上，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吴传启（明反），反王、关、戚（暗反）。

舒声能否认以上的大量史实吗？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客观上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主要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主要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主要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但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中央文革的革命路线，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

五、关于保卫组整“黑材料”问题

关于校文革保卫组（二组）是否整过师生“黑材料”的问题。舒声在文中说：

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但校文革的保卫组（二组）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1967年7月10日，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56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13集，每集都有一百多页……在燕南园63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67·5·6，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十个人……（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以上舒声所言是不实之词，校文革保卫组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保卫组有纪律，被禁止参加学校运动。而舒声所引用的资料，竟然是文革中“井冈山”派性小报《新北大报》1967年7月26日派斗文章中不实的派性资料。过了半个世纪，舒不经核实，仍然引用当年派性小报的不实之词为根据。校文革保卫组（又称二组），业务上受公安部、市公安局领导，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及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根本没有师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什么负面材料。1967年7月10日，“团、零、飘”对保卫组的查封，属于破坏公检法机构的打、砸、抢行为。至今却被舒声认为是正义之举。由此可见文革对人的思想毒害之深远。

当年北大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在《华夏文摘增刊》2017年5月1日第1078期的《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一文中，对当年的所谓“二组黑材料”问题有清晰的记敍和说明。谢甲林指出：“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工作组保卫组和校文革保卫组从未驻过南阁，从未在南阁存放过任何材料或其他东西，也不知道任何组织或任何人存放过什么材料。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

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63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

谢指出关于学生的所谓“黑材料”：“是保卫组配合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侦破反革命案件搜集的笔迹资料。查对迹痕，属侦查破案范畴，是高等法学系、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刑事技术学科，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一项重要的刑事技术工作。它是破案工作的重要手段，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单就笔迹而言，通过笔迹筛查，把绝大多数或百分之百不沾边的笔迹人排除，对他们是有利的。例如，有一天在地学楼南墙外贴出一张署名“赤心”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攻击林彪，说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但标题却是《毛主席的晚节保不住了》。当时，保卫组把它作为一类重大反革命案立即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立即派侦察员到北大来了，要保卫组协助破案。为此，保卫组向各系各单位收集、借阅了大量笔迹资料，其中确有“舒文”中说的“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和大字报底稿”，其目的是查对“赤心”大字报的笔迹。经过反复查对，排除了北大的人作案。最后，公安局从外校侦破了这起案子。”

以上即舒声所谓的北大校文革“黑二组”整师生“黑材料”，残酷迫害“井冈山”群众的真相。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井、红、团、零、飘”（“井冈山”的前身）于1967年7月10日清晨查抄北大保卫组，抢夺档案，起因于陈伯达当日在北大的讲话，他纵容、准许打、砸、抢公检法机构。而查抄出的师生“黑材料”完全是子虚乌有。还应指出，8月24日，谢甲林被“井冈山”绑架并毒打至伤，致使保卫组一度停止了工作。此事至今未见有人向谢甲林公开道歉。所谓的“二组黑材料事件”，反映了当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煽动与毒害之下，北大校园内派性之无理性与猖狂。反映了文革把人的思想搞乱，把人性扭曲所形成的恶果。有人至今走不出文革的迷障，表明了文革遗毒之深远。

六、关于聂元梓遇刺

舒声在文中说：再如该书（注：指《抢救记忆》）记述“3月29日（1968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也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具体情况，当时在现场，后被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¹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舒声批评笔者“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这未免太武断，似乎笔者在编造故事，但笔者是有根据的，根据是当事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的回忆。聂在《聂元梓回忆录》第271页（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中写道：

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以上即是我写聂元梓遇刺的根据之一，此事当时全校都知道，但我还是按受害的当事人聂元梓的记叙来写的，并非舒声所言是“道听途说”。但聂元梓的此段回忆也有不准确之处，例如聂说“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刺伤了”。据我了解，凶手并非樊能廷。

¹ 见《燕园风云录》第三集，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页6-17，蔡华江：《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页17-19。

因此我在书中并没讲是樊能廷刺伤聂，没讲凶手名字。但聂在那天遇刺受伤是确有其事，并非舒所言“纯属子虚乌有”。笔者所说确有其事，除了聂本人的回忆文字之外，根据之二：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遇袭遇刺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就站在聂旁边，聂遇刺后曾靠在李的臂膀，李的头部也被打了一个包。因此卫戍区后来在北大曾追查此事，当时北大两派群众都知道此一情况。根据之三，据《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主编2008年版）记载，1968年3月29日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戍区的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根据之四，在7.28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及此事，对聂元梓说：“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请问舒声，以上四条根据是否属于你所谓的“毫无根据”呢？当年全北大都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它从历史的记载中抹掉呢？

根据樊能廷（化学系63级学生）本人申辩，他不是刺聂凶手，我经过调查，相信樊能廷的申辩，刺聂应是另有其人。之所以发生樊能廷是凶手的误会，因为樊当时在现场，但他手中拿的不是小刀，而是一把改锥。当时樊举起了改锥要打聂，却被人拦下，没能贴近击中。樊能廷本人在《燕园风云录》（三）中《北大刺聂真相》一文中，说他手中拿着“一把改锥——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注：确有准凶器）。樊说他“看到聂元梓，不由满腔愤恨，举起改锥，隔着两、三层人要打她。”（注：樊承认有动机，有行动。）结果呢？樊说，“隔着两、三层的人，也够不着聂元梓。”“恰在此时，李将军大喊了一声什么，人群就迅速分开了。”樊便“跑回暂栖身的32斋去了。”（注：樊没能得逞，不能算是凶手，只能说是企图伤人。）误会怎样产生的呢？这就和李将军大

喊那一声有关。樊能廷在上文中说，“后来听说，李将军喊叫的是‘有刺客’，或者‘抓刺客’，而且李将军的喊声似乎是我手中改锥的举起，脱口而出的。”（注：李将军不愧是军人，反应很快！）樊在上文还说，后来在追查凶手时，“李将军眼尖，指认得很真着，说是‘穿黄军装、带黑白边眼镜’，确是我当时的穿戴。”（注：事情并非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凶手是谁呢？笔者于2017年1月在北京采访了二位现场目击者校友。

1月15日，原哲学系64级学生孙厚才对我说：3月29日那天，他站在聂元梓旁边，李钟奇站在聂另一边，他看见有几个人从东边冲着聂元梓过来，有个叫樊能廷的手里拿把改锥，李钟奇马上让人把这几个人拦住。这时聂的侧后方有个人（肯定是井冈山的），刺伤了聂的头、脸，聂马上流了好多血，要跌倒，孙厚才马上抱住了聂。孙厚才的证言，说明樊能廷不是真凶，真凶是从聂的侧后方进行的袭击。

1月26日，在国政系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举办的宴会上，历史系65级校友徐森对大家讲，“文化大革命很残酷，人性被扭曲的很严重，有人变得非常暴力。3月29日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聂元梓陪李走到32楼前，我站在聂元梓侧后。亲眼看见一个人，也站在聂后面，手拿一根细长的罗纹钢筋，一米多长，头很尖，冲着聂的头脸砸下去。好狠！聂的头、脸流了很多血，倒在李钟奇的怀里。”

凶手是谁？肯定是“井冈山”的，但始终没有查出来。由于没有死人，凶手击刺聂也并未击刺到要害，聂本人并无大碍，因此也没必要追究，后来不了了之。

从此事可看到当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把人群撕裂到何种程度，对自己的师长、同学，有人竟充满了仇恨和滥施暴力。文革的罪恶之一，就是对善良人性的毁灭。

1968年3月28日至29日凌晨，北大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以至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于29日早晨亲自赶到北大制止武斗。武斗过程：据宫香正在《记忆》182期《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一文所说，28日晚“井冈山”武斗队首先动用武斗工具驱赶40楼的“公社”学生（有些原“井冈山”校友说“井”占40楼在“公社”占31楼之后。这

一史料分歧可再考证。重要的是“井冈山”在28或29号占领了40楼，这是双方都确认的事实）；宫香正说，随后从28日晚11时至29日凌晨，“公社”总部为控制宿舍区，出动武斗队驱赶31楼“井冈山”同学。而后，“井冈山”马上报复，赶走了32楼的“公社”同学。中文系校友索世晖告诉笔者，他那天就是被“井冈山”从32楼赶走的。29号，在两派来往驱赶、推撞中，两派同学都有人被打、受到损伤。天亮以后，聂元梓、李钟奇到现场视察、制止武斗，二人竟也遇袭受伤。

当年两派武斗，两派都有责任，都错！都丧失了理智！没有正义一方。没有反抗侵略的一方。争论武斗中谁对谁错没有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讲，两派都错。当有人拿起冷兵器，要与自己的同学、师长、同类拼杀时，他就已跨过了做人的底线！他就是不人道的，背离了人性之善！这是人们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永远摒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

两派真正参加武斗队的人员很少，根据后来工军宣队进校后，两派分别上缴的武斗工具推测，“井冈山”的武斗人员有700人左右，“公社”的武斗人员有900人左右。两派的逍遥派有10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占全校师生86%以上的人是逍遥派。他们厌恶武斗，躲避武斗，不参加武斗，许多人都回家了。这大部分师生在当时相对而言是代表了正确的方面，但他们对武斗局势无可奈何，形势被两派激进的头头所控制。

七、关于周一良和高海林的和解

文革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五一六通知》号召人民群众不但要打倒混进党、政、军及名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第二项“打倒”就是冲着高级知识分子去了。1966年8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两侧有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訥（毛泽东女儿、历史系65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

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訥再到北大调查时，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很快在全校传开。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历史系尤甚。

舒声写道：王书又说：“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该书80页），也是搞错了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所以该书说“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王书第82页），也是夸大其词。

以上第一句“郝斌”“喊话”是笔者的笔误，舒的指误正确，应是周一良，后面笔者也是写周一良如何如何。但舒声与笔者犯了同一个错误，事情的起因并不是由周一良“隔空喊话”而起，而是由周一良“托人传话”而起。“隔空喊话”是周一良后来传递的宽容、和解的信息。

笔者在书中这样描述了师生二人和解的过程：

1998年年初，北大百年校庆将至时，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30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到北大请时任历史系系主任的周一良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到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时隔30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之大，可见当年高对他伤害之深。

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隔了半年，1998年6月，时年85岁、因患帕金森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烦人代劳，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还想说的话》。他先把前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紧跟着，对高海林的态度，周先生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

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他接着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¹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并且做了回应。1999年4月，周先生曾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采访者顺带提及“喊话”一事的时候，周先生对他们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董正华、刘一皋主编：《中国留美学人口述史：周一良访谈录》19页）

历史系学生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张口就说：“这个人左得很。”他与我的印象相同。但在我的印象中，高海林在文革中也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亮点。1967年7、8月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高潮时，高海林曾以新北大公社“砲兵营”战斗队的名义前后贴出两篇大字报：一论、再论《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虽然该大字报喜欢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类夸张、绝对化的概念，但他当时在全国反军狂潮的形势下，确有一种反潮流，坚决捍卫长城的气慨，旗帜很鲜明。周一良老师说当年师生们“同样信过神，上当受骗。”这也应是由衷之言。周一良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成员，成为“四人帮”的御笔，是他痛悔之事。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

以上即笔者书中原话，这是“夸大其词”了吗？

“相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周教授对高海林喊话和解时引用鲁迅先生的话，高海林不久与周老师通了电话，师生之间“一笑泯恩仇”。高海林还说要到北京找周教授，后来二人是否见面？笔者不知。但“相逢”似不必机械地去理解和较真吧？

郝斌老师对周一良和高海林师生之间的和解之事有一评论，很中肯，郝老师说：“道

¹ 周一良选集：《郊叟爆言》92页，新世界出版社。

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高海林在河南某大学教书，授业认真，口碑不错。……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只是自侮自恨，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直到周先生的喊话入耳，他才把包袱放下。”郝又说：“‘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才把许多人推上了暴力的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者和被整人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宽容平台，才是正理。”（见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

我很赞同郝斌老师以上的评论。请问舒声：你是否赞同：大家应共同来搭建和解、宽容的平台？而不是一味宣扬对立和仇恨？

八、关于牛辉林

牛辉林曾经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把手，当时是位较激进的同学，他所领导的“红旗飘战斗队”，被很多同学认为是“井冈山”里最左的一翼。有人曾发现牛当时有反周（周恩来）的问题，但舒声却为之辩护。舒在文中说：

例如该书写道：“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两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该书165页）。且不说文中所说的1966年6月的时间不对，那是还是工作组时期，“新北大公社”和“红旗飘”根本没有成立，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秘而不宣的纲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

以上舒文指误的时间是正确的，不是1966年，这是笔者笔误，应是1967年6月中旬

发生之事。至于舒以牛住三楼宿舍為由便否定牛的“形势分析”，则太牵强、无力了。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的战斗队那有什么固定办公室，开会商量事可能是任何成员的宿舍。“红旗飘”有十几名成员，有住一楼的，难道不能在一楼房间开会吗？

我判断牛辉林有“祕而不宣”的反周纲领有以下根据：根据之一，我确实有消息来源（赵、史二人向我报告）；根据之二，当时关于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之说，关于“新北大”、聂元梓是新的“保守派”（保周）之说，曾在地派中的极端派流行，而牛则称得上是“井冈山”及地派中的极端派、激进派；根据之三，我毕业后曾于1971年应历史系领导邀请，回历史系讲述1967年极左狂潮，讲了牛关于反周的“形势分析”，原“井冈山”的教师无一人质疑，说明他们有正常、合理的判断；根据之四，1971年北大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3月4日牛辉林在全校坦白大会上公开坦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说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集团”。他当然不是五一六分子，这是给自己扣了个冤案，但他有没有“打倒周恩来”的“五一六思想”呢？是否心虚顶不住了呢？根据之五，就是牛辉林1967年的“8、9反军报告”，他公开点名，矛头直指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根据之六，当年牛辉林、“井冈山”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是“新的保守派”、“最大保皇派”，那么“保”谁了？不可能是保陆平、刘、邓吧。到底是指“保”谁了呢？当年不能公开说，但两派的领导和部分群众都心知肚明嘛！

以上五条根据中最重要是第一条：消息来源。当时笔者是“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总召集人。哲学系“顶风船”战斗队是“66”的骨干战斗队之一。“顶风船的队长赵春福（文革后任北京市委高级党校校长）和史新国两人找我，非常郑重、严肃地向我汇报，汇报他们所听到的牛辉林对形势的分析。我们三人讨论后取得共识，认为牛辉林说周总理是旧政府代表，是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潮，是分裂中央。总理是好人，“公社”要坚决保周。

舒声不肯引用笔者判断的根据。笔者引用书中有关部分内容如下，请读者分析、判断。

在1967年的3月至8月，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牛辉林所谓的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聂说：“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到了许维纲，许维纲谈了对文革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一边’。”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地两派的本质分歧，但“不是所有单位、所有群众都明瞭。”“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聂元梓回忆录》第216页）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当时，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但牛辉林并没有公开讲出他的观点，只是把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做为“新的保守势力”、“老保”，进行打击。牛所说“公社”一派是“老保”，到底“保”谁了？牛没说出口而已。但这种根本分歧，“公社”与“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瞭。当年的舒声可能也不明瞭。

我毕业后，北大在1971年清查“516分子”时，“红旗飘”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春节时，历史系领导张万仓老师突然到家里找我。他估计春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邀我到北大历史系讲讲“516”的问题。我应邀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讲了1967年6、7、8月北京市、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讲了“516分子”是三反，反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军、反周。讲了“红旗飘”成立不久，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就是反周，并讲了我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红旗飘”是反革命，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依我对当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观察，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后来发展成全国规模的“秋后算帐”，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在中央上层，是毛、周联手进行清算。毛泽东打倒政敌刘、邓的目标已完成，造反派已无利用价值。周与毛在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政领导系统，需要扫除障碍，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于是便联手“秋后算帐”。真正的“516兵团”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对此中央文革有调查员的报告。可是全国竟然抓了300多万“516反革命分子”，是文革后期的一大冤案。“516”

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

以上为笔者在拙作 168 至 170 页的内容。

最近，笔者看到校友、原“红旗飘”成员屈长江的回忆文章《良知漫漶的岁月》（《燕园风云录》四）文中屈长江承认当年“红旗飘”中存在着“有一种理论叫‘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第 58 页）但屈没有深入详谈。有关真相，希望有人能进一步揭示和佐证。

九、关于乔冠华为王福时写的证明

1. 舒文写道：“该书第 7 页：‘1986 年 9 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 1948 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经查，乔冠华是 1983 年逝世的，怎么可能在 1986 年为王父出证明呢？”

2. 这是件小事，且与北大文革无关，但笔者却不得不讲清楚。因为按舒声的说法，笔者似乎有编造故事的嫌疑。首先笔者并没说乔冠华写此证明的时间是 1986 年 9 月，而是说父亲王福时离休的时间。单位里每个人退休、离休时间不同，在每人离休或退休之前很早一段时间，人事科便要普遍内查外调，确定每人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以便确定离、退休的待遇。对老干部身份、资历的鉴定，会开始的更早一些。这本是常识，但舒声却要先歪曲笔者关于乔写证明的日期，然后断定不可能有此证明，使笔者感到这是舒声有意要污化原对立派校友，指责笔者似乎造假。我对舒这样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舒声如真想认真考证乔冠华出证明一事真伪，去一趟大百科出版社人事科调查询问，不就明白了吗。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写《证明》的日期是：1983 年 1 月 23 日。《证明》全文如下：

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

刘尊棋、刘思慕二同志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材料所说情况均属实。

“远东公报”（英文）系我党领导下在香港出版对外宣传刊物。1948年至1949年，王福时同志在美国旧金山为该刊翻印发行。从1948年秋至1949年秋，在香港我党对外宣传是我负责。（注：“远东公报”即在美国发行的“远东通讯”）

乔冠华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三日

以上是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手写的证明材料，其复印件，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档案馆内的《王复兴专档》之中的《王福时卷宗》内。档案中，乔为王福时写的《证明》，是乔冠华手迹的复印件。

十、几个小问题

3. 笔者在书中有两个人名写错了，109页“谭立夫”应是“谭力夫”；99页“樊立群”应是“樊立勤”。感谢舒声的指正。

4. 舒声指误“第210页，说‘东总’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于毅夫是统战部长，都有误，他们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此处舒一对一错。于毅夫确是统战部副部长，不是部长。但刘澜波文革前是电力工业部部长，任副部长是在水力电力部的任职。

5. 舒声以下指误不对。舒说：王书“第43页：“那时（1966年6月）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叶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舒说，“实际情况是上个世纪60年代，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鸡蛋、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笔者这段描述涉及当时的真实社会情景。实际情景是当时确实存在卖零食的小商贩。北大当年处于郊区，四周有许多农村，有许多小商贩不奇怪。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农业六十条》后，农村是允许农民保有自留地并自养家禽，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的。割城乡资本主义尾

巴是文革中期 1970、1971 年“一打三反”时的事情了。但这个“尾巴”极其顽强、始终也割不清。否则就不会出现 80 年代初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户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了。舒声认定 1966 年 6 月时北京海淀区不存在小商小贩，这不符合实际。笔者当年就经常在傍晚于校园内，花几分钱向推车的小贩买茶叶蛋吃。舒声在此处犯了想当然的教条错误，且所述教条亦错。

6. 舒文第 1 页写到“李清昆”，名字写错了，应是“李清崑”。

7. 舒文第 1 页引用《抢救记忆》第 35 页的一句话，引用错了。原文是：“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不是“预言”。把“预演”写成“预言”，读者看不懂了。

8. 舒文第 3 页引用《抢救记忆》第 191 页一句话，引错了。舒文写道：“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舒文增添了“重点”二字，句子不通了。

9. 舒文第 4 页讲第三个大问题，引用《抢救记忆》关于牛辉林“秘而不宣的纲领”之内容时，写错了引用该书的页数，写成了“165 页”，不对，应是“168 页”。此外，舒文把原书原文“赵春福、史新国”二人名字，写成了“赵某某、史某某”。笔者在原文写了二人真实姓名，是为着还原真实历史。舒却把原文篡改了，用“某某”代替名字，显然是为了模糊事情的真实性，不大可能是笔误。

舒文仅 8000 字，出了以上许多错误。舒声批评笔者“由于不严谨”出了很多错。感谢舒声的提醒。让我们都注意，今后行文注意更严谨、更认真，并更仔细校对吧。舒声对拙作的一些正确指误，笔者将在拙作再次印刷时，予以纠正。■

2017 年 8 月 7 日

【评论】

说“北大井冈山兵团保王、关、戚”就是文革思维吗？

胡拾音

拙文《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在《记忆》第 185 期发表后，



校友陈子明和林爻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的文章《评胡拾音的文革思维》（下文简称《评》文），刊于《记忆》190 期。

《评》文说拙文的附图看不清，“读者们无法比对阅读原文文字，那么，只能听凭作者任意扯淡了。所以笔者认为《胡文》附图质量低劣，没有证明力，白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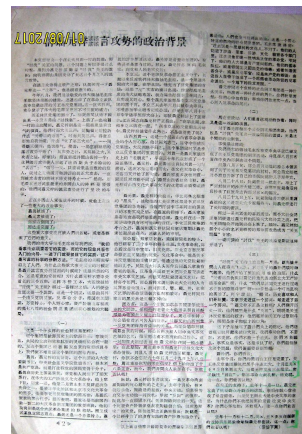
看不清好办。上次附的图片只是示意而已，确实小了，这次附上 4 张大一点的照片，读者可以看清，也可以放大。

（传单第 1 版）拙文引用了三份井冈山兵团的材料和一篇《新北大》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1967 年 8 月 31 日发表在《新北大报》上，井冈山兵团七纵“长缨在手”战斗队的《斩断伸向中央的这只黑手》一文。因为这篇文章明确表达了直至这一天为止的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立场。文中写道：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她（指聂元梓——引者注）抛出所谓“揪出新的黑线”的反动论调，扬言“只出来一个陶铸嘛”，要揪出“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抛开主席指出的大方向，企图重搞一个资产阶级的方向；她自称“江青派”、分裂中央文革，在全市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混乱；她以“林杰—关锋—康生”的反动逻辑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她一手炮制了什么“摘

桃派”的理论，为其全面夺取市革委会大权制造反动舆论，并直接策划了炮打谢副总理的罪恶活动……。

文章谴责聂元梓“分裂中央文革，在全市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混乱”，“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中央的领导”，“直接策划了炮打谢副总理”，等等，罪名是一大串。文章表明，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核心力量是坚决反对聂元梓这样做的，不仅反对，还要“斩断”聂元梓这只“伸向中央的黑手”。这篇文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站在关锋、王力一边的坚定立场。他们和关锋、王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疑问呢？



（传单第2版）

对于拙文列举的若干明显的证据，《评》文装作没有看见，不置可否。有关北大文革历史的讨论有三年多了，发言的井冈山兵团的朋友中有几位，就是不承认他们保过王、关、戚，即使把他们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摆到眼前，也是视如无睹。对历史不认账，算是什么思维呢？



《评》文还写道：《胡文》作者，加上另一位常在博文和网刊发表东西的胡先生，庶几是拥护“文革”、坚持“文革”的人物；明知“不是笔者能够说得清楚的”，还要强说，无非是他们“文革”思维乃至“文革”立场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好奇怪的逻辑！说了一句“不是笔者能够说得清楚的”，就推论是“强说”，就是“文革思维”。反过来，你们能把文革所有的事情说清楚吗？你们的文章是不是也是“强说”呢？也是

文革（传单第3版）思维呢？

不了解情况，却还要“强说”的，确实有人。比如舒声先生，对季羨林先生并不了解，甚至连《牛棚杂忆》都没有看明白，却非要拿季羨林先生说事。还有一位张从先生，对“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情况并不了解，却硬要说“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胎死腹中”¹。他大概没有读过卜伟华先生著的《砸烂旧世界》或万一巨二先生的博客，那里对北京市夺权的过程，乃至聂元梓和“夺委会”负责人方臣的谈判和达成的四条协议，都有详细的介绍。聂元梓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做法是“只联合，不夺权”，为什么，等中央精神呢。现在看来，“只联合，不夺权”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明智谨慎的做法。一方面响应了中央的号召，来者欢迎，退出自由，联合搞得热热闹闹。另一方面，又没有实际的夺权行动，没有和什么（传单第4版）人或团体发生冲突。而参加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许多群众组织，认为参加了大联合，也不再生事，这对大局有益无害。而一旦中央的方针明确下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就召开大会宣布解散了。有始有终，善始善终，何得谓“胎死腹中”？对此，当年北大《动态报》有过报道²，张从先生大概不知道。张从先生不仅强说，还带有明显的倾向。比如他在《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文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后来市革委会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笔杆子”是谁呢？张从先生没有说，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明明知道而故意含糊其词。轻描淡写、含糊其词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很惊人的。据笔者所知，所谓笔杆子，就是吴传启、林聿时等人，地点也不是北京饭店，而是民族文化宫，也没有设什么机构，就是谭厚兰和吴、林等人开了个会，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要求戚本禹出掌北京市大权。



¹ 张从：《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2期

²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于1967年3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告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即将结束活动。3月3日北大《动态报》对此作了报道。1967年3月7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行最后一次活动——分系统大联合誓师大会，3月8日北大《动态报》对此作了报道。见胡宗式：《再谈1967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一）》，载《记忆》第152期（2016.3.11）第33~45页。

张从先生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要回避吴传启、林聿时的名字呢？如果张从先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么是否就是“强说”呢？如果张从先生知道详情，是否可以披露一二呢？特别是那个设在北京饭店筹备夺权的机构，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后来学部吴传启一帮人掌握了北京市革委会许多实权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机构谋划的呢？如果真有谭厚兰和某些人设立的这样的机构，那么其重要性，就要远远超过“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之类的临时性民间组织了。

文革中的事情，我们不了解的太多了，许多内幕，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但这并不能动摇人们追求真相的决心。许多人写的有亲身经历、有真实内容而非拼凑的文字，就是这种决心的体现。一些人致力于“抢救历史”，也是出于这种信念。笔者相信，百年之后，千年之后，仍会有人研究文革的历史。笔者和另一位胡先生发表的若干文章，就是希望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材料，提供几个文革亲历者的看法和所依据的史实。迄今为止，除了一处将“郭玉堂”误写成“高玉堂”以外，还没有人指出基本事实有什么出入，同笔者进行具体的讨论。回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述说当年的看法（哪怕是当时的错误看法），或引用当年的文字材料，以资后人研究，是不能扣以“文革思维”的大帽子的。

张正儒先生在《记忆》189期的“编读往来”中有一段来函，称：文革中要想搞垮或丑化一个群众组织，往往给这个组织安一个“黑后台”或说这个组织“背后有黑手”。

《记忆》185期胡拾音的文章还沿用这种文革思维和文革逻辑，让人感到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应从大处着眼，仅利用一张2分钱的传单，大作文章，攻击一个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有什么必要和意思呢？

也许是我没有讲清楚。“定价2分”不是我编造的，是清清楚楚印在传单第三版右下角的。当然，传单现在的价格已经不菲了。这不是二分钱的问题，是传单内容的问题。从这两期《记忆》上看，其关注度为笔者始料不及，说明这份传单并非毫无价值。如果将来有开放的文革档案馆有意收藏，笔者愿意无偿奉送，供文革史研究者查阅。

作为北大文革的亲历者，说井冈山兵团是保王、关、戚的，不能只凭嘴说，必须引用

当时的多种材料，证明所言不虚，不是无中生有。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怎么就成了不是“从大处着眼，仅利用一张 2 分钱的传单，大作文章，攻击一个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呢？对于这样的断言，笔者实难苟同。

顺便说一句，对张正儒先生文字中的第一句话，笔者深有体会。当年，新北大公社不正是被称为“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吗？“谭震林是黑后台”吗？聂元梓不是被称为“分裂中央文革”，是必须“斩断”的“伸向中央的黑手”吗？张正儒先生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体会不到新北大公社群众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极度压抑的心情。大喇叭里天天喊的这些指责的话语是从哪里来的呢？新北大公社有资格当“二月逆流派”吗？公开拥护过“二月逆流”吗？聂元梓、孙蓬一确实向陈伯达、江青提出关锋、王力“结党营私”，但并未公开说过，“分裂中央文革”的指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些指责的源头，不就是陈伯达的 6.5 讲话和其他讲话吗？不就是王、关、戚一伙和拥护他们的势力吗？实事求是地说，在王、关、戚、吴传启一伙垮台前，在“二月逆流”得到平反之前，新北大公社或原公社成员确实很难自辩，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甚至很长的时间来证明的。从 1967 年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试图恢复某件事情的本来面目（很遗憾，包括笔者在内，许多朋友保存的文革资料几十年前就被抄掠一空，现在做这件工作非常艰难，能做的事已微乎其微），竟然被指为“攻击一个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在 21 世纪的今天，使用“攻击”一词，不算“文革语言”、“文革思维”呢？另外，当年因“二月逆流”和王、关、戚问题所引发的矛盾斗争及其在北大的反映，仅仅是“不同意见”吗？倘若王、关、戚不垮台，吴传启一伙扶摇直上，新北大公社还能生存吗？笔者和许多朋友还有今天吗？

现将传单的照相版公布于后，并选择三节，略作说明：

（1）拙文《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引用了“至于我井冈山的一些负责同志，的确同当时披着群众组织负责人外衣的洪涛、刘郅、王恩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这如同他们当时同其他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见过面，谈过话一样

普通又寻常，光明且正大。固然没有能够及时识破王恩宇、洪涛的反革命面目，是严重的错误。对这一错误，我兵团负责人早已做出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一段，见传单第一版，现用红线在旁边标出。

(2) 传单第四版“**聂元梓反革命家族简介**”一节中有一句：聂元梓的第一个丈夫：胡静一，叛徒。这显然是作者的编造。笔者问过聂元梓，她说：“胡静一是和我大哥聂真一起搞革命的，在河南时，到我们家来过，比我大20来岁，后来到河北去了。”聂元梓1933年12岁去开封念初中，1937年离家去山西参加革命工作时仅16岁，何来第一个丈夫？

(3) 传单第四版还有一篇文章：《**聂元梓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节录如下：

聂元梓在十二月十一日校文革非法党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公然向全校喊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破公立私的光辉榜样”的反动口号，竟敢狗胆包天，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事后，这个资产阶级政客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指使一些善于圆场的御用文人为之辩解曰，是什么“口误”！

“口误”！好轻松！聂元梓平日玩弄阴谋，诡辩扯谎的时候口齿伶俐，技娴艺熟。为什么一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革命口号，就结结巴巴，谬误百出呢？这不恰恰证明聂元梓是对无产阶级政治一窍不通的资产阶级政客吗？

可怜的人们，按照你们的“口误”逻辑，应该说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破私立公的榜样”啰？这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言论！请问你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私”在哪里？在你们的资产阶级肮脏的灵魂里，根本就没有树立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根本就没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根本就没有树立林副统帅的崇高威望！

文革中颇有一些因口误而遭批判、批斗、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件，但刊于小报的并不多见，因为在小报上传播“反动言论”，弄不好也是会被入罪的。聂元梓也发生了一次口误，被人抓住，因而有了这篇文章。聂元梓讲话发生口误，当然是错的，但按这篇文章作者的分析，聂元梓即便不发生口误，她的话也是错的，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言论”。

笔者节录这一段，可算当时政治斗争生态下一个小小的例子，仅供现在的读者一粲，不必较真。

美国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081期（2017年6月5日出版）发表了舒声、郑实的文章《北大校文革及其“二组”必须彻底否定——兼评谢甲林的文章》。文章结尾写道：近来，国内有一股为文革翻案的逆流涌动。5月7日文革代表人物聂元梓在会见来访的蒯大富时说，要活到100岁，等到为自己正名、为文革正名的那一天。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1985年被定为“三种人”被开除出党的宫香政、北大校文革“二组”负责人谢甲林在网刊上发表文章，为自己和聂元梓在文革中的行为辩解、美化，都是这股为文革翻案逆流的具体表现。善良的人们要提高警惕，回击这股逆流，不让他们的企图得逞。



今年5月7日蒯大富去看望聂元梓，笔者于5月10日在网络上看到蒯大富和聂元梓两人的合照，但没有文字说明（见左图）。6月5日以后，有人给照片添加了两人的年龄，仍然没有文字说明。而舒声、郑实却说：“聂元梓在会见来访的蒯大富时说，要活到100岁，等到为自己正名、为文革正名的那一天。”

不知舒声、郑实的这种说法从何而来？蒯大富和聂元梓会面时你们并不在场，聂、蒯说的话你们怎么知道？为弄清真相，笔者于6月9日特地视频询问当时在场的聂元梓的儿子，他说“照片是我拍的。他们两个人谈话，根本就没有谈文革。由于蒯大富口齿不太清楚，老太太的耳朵有些背，我在中间当翻译。蒯大富说：‘老聂你好好活着，活到100岁时，我来主持为你祝寿。’老太太说：‘你也要好好活着，要不然，你到时候来不了咋办？’”

对于刚刚发生的一件寻常事情，舒声等人都是可以随意加以编造，再指责为“为文革翻案”，加以讨伐。那么，对于五十年前北大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叙述还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呢？舒声先生动不动指责他人“为文革翻案”，是“一股为文革翻案的逆流”，还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号召人们“提高警惕，回击这股逆流”，舒声先生的这些言论，是什么思

维呢？善良的人们如果不听他的，是不是文革大难又要降临了？

对于舒声、张从等人来说，于他们最有利的，其实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968年10月13~31日举行）公报中的一段话：“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不过，公报发表的时候，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群众组织早已解散，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已经刮起，大批同学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离校，谁也无法利用这个公报大做文章了。

毛泽东后来亲自否定了“二月逆流”的定性，历史也否定了这个公报。然而，用公报中的这段话来衡量，新北大公社始终受到压制的原因何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某群众组织保过王、关、戚，并不是要追查他们的什么责任。文革中很少有什么组织没犯错误。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都跟着喊过“打倒刘邓陶”，两派都错了。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的时候，自己有什么错误，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批评别人的错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编造个故事再加以批评，这倒是文革中常见的手法。■

【评论】

评毛泽东给聂元梓戴的“三顶帽子”

宫香政

张从等二位同学（舒声、郑实）在“华夏文摘”增刊1081期上发表文章《北大校文革及其“二组”必须彻底否定——兼评谢甲林的文章》，其中大量引用了谢静宜的回忆录中关于毛泽东对聂元梓及其为首的校文革的严重不满和恶劣评价，并煞有介事地提醒读者警惕有人在为文革翻案。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决议，说明毛泽东亲自动的文革的理论、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包括他的一系列言论都是错误的。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亲手制造了多少起冤假错案是有目共睹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坑的儒数十倍于秦始皇”。经胡耀邦同志平反的冤假错案何止数十万计？张从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言论符合自己的口味，所以站在派性立场上，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的错误言论捧为“圣旨”，认为是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的“定性”和“宣判”，表明正是他们在使用‘文革思维’在为文革翻案。

谢静宜发表毛泽东这些话，一是表露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不满；二是想借此说明她和迟群在北大和清华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聂元梓、孙蓬一打成“反革命集团”、扣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错误行径是“奉旨而行”的。

毛泽东给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戴上了三顶帽子：“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我认为，毛泽东是在推脱自己的错误，掩盖“四人帮”的罪行，嫁祸于人。

一、关于“派文革”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聂元梓是文革初期北大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毛泽东把它捧为“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授意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王任重同志（后来被毛泽东抛弃、打倒）直接指导下，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由于康生反对聂元梓，他通过（康生办公室的）张恩慈（原北大哲学系教师）支持孔繁和杨克明，排斥聂元梓，造成校文革内部出现裂痕，在此种情况下，为保住聂元梓这面旗子，江青出面讲话：

“孔、杨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反映”，一棍子把孔繁、杨克明二位打趴下了，（孔、杨与聂均属北大社教“左派”、亲密战友），造成“左派”队伍第一次分裂，为后来孔、杨参加井冈山，并当上井冈山领导成员埋下了伏笔。

1967年一月，毛泽东号召红卫兵全国性夺权。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关、戚为了

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占领政治制高点，支持以北师大谭厚兰为首的红卫兵组织到高教部夺权；1967年1月18日中央文革和周总理接见北京市红卫兵头头时，周总理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应该参加社会上的夺权斗争，要为夺权做出贡献”。遵照总理指示，聂元梓就派出北大红卫兵也去高教部夺权。试想，众多红卫兵组织同时到一个单位去夺权，能不发生冲突吗？因而在高教部北大与师大发生了分歧与摩擦。面对这一分歧，作为中央文革要员应该公平合理予以解决。然而，关峰、戚本禹得知情况后，偏袒谭厚兰，狠批聂元梓，强迫聂元梓给谭厚兰道歉，这在北大造成不良影响。

1967年二月，发生了“怀仁堂事件”，一些副总理和老师批评中央文革搞乱了国家正常秩序，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逆流”。王、关、戚立刻授意师大谭厚兰率先贴出大标语，打倒若干个副总理和老师，震惊了全国。3月9日，林杰向其嫡系讲话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的司令部。现在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斗争。”洪涛说：“现在要揪出一个保人保的最多的人，这个人比李富春还大，但不是中央文革的，揪出来要吓你们一跳。”矛头所指已经明明白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经过冷静分析，认为谭厚兰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北大不能随波逐流，所以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北大行动慢、表态晚、调子低。因而被社会上一些单位骂做“二月逆流派”、“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每个单位对“二月逆流”的政治态度非常看重，他们认为“怀仁堂事件”是抵制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的反扑，聂元梓和北大这种表现，使他们极为不满，所以自此开始，中央文革就对聂元梓不断进行打压，江青批聂元梓说，聂元梓“骄傲啦”，聂元梓“不听我们的话”啦。

上述两件大事在北大造成很大影响，少数师生对聂元梓及校文革产生了怀疑，认为聂与校文革没有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贴大字报批评聂与校文革，有的人例如牛辉林同学，文革开始时他紧跟聂元梓，还与聂元梓等人一起抄了聂元梓前夫吴慨之的家，此时他抛弃了聂元梓，投向了王、关、戚的怀抱，与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郅拉上了关系，

竖起了反聂大旗。

王、关、戚看到北大有裂缝，就抓紧扶植反对派的力量。关峰的老婆周英、林杰的老婆王乃英、‘红旗杂志’记者张超、学部的王恩宇（是关峰的密友吴传启、林聿时手下的干将）、洪涛，以及民委的刘郢频繁到北大活动，点火与基层，策划于密室，为反对聂元梓及校文革一派政治力量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把搜集到的材料及时向王、关、戚汇报。

1967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王、关、戚将学部二十余人塞进市革委会，掌控了市革委会的大权。吴德同志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中有这样的叙述：“（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质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参加革命多年的聂元梓和孙蓬一凭政治嗅觉，预感到王、关、戚这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做法极不正常，尤其是学部的吴传启，此人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是关峰的密友，吴传启在学部掌权，又在幕后掌控市革委会大权，是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种威胁。为此，聂元梓和孙蓬一要求单独向江青汇报这些情况，结果是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听取了汇报，戚本禹当场极力为王、关辩解。尽管江青当场态度温和表示感谢，却变成了聂元梓向王、关、戚的公开宣战。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峰、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说：“希望以后好好合作，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峰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聂元梓回忆录 220——221 页）。聂元梓从保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大局考虑没有听从他们的游说，指示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于6月1日抛出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吴传启立马傻了眼，王、关、戚也慌了神，中央文革也非常被动，关峰让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到外地躲一躲。为了保护王、关、戚，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和表面统一的形象，封住北大的嘴巴，1967年6月5日，陈伯达拿出了善于给对方戴上政治帽子的手段，抛出了

“6.5讲话”，他诬捏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他把王、关、戚视作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

陈伯达这一政治炸弹炸懵了北大师生，重新洗牌，各群众组织蜂拥而起，纷纷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有的保，有的反，校文革也发生了分裂。王、关、戚看到时机成熟，1967年7月11日，学部派往北大的联络员李惠国传达林杰、林聿时、周景芳的指示，要求“反对派联合起来，否则的话，聂孙会把你们吃掉”。王恩宇又做了四点指示：一、你们要联合起来，不要争名称，要求同存异；二、要让周培源当一把手，理由是小将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周培源可以与“老佛爷”（聂元梓）对抗，使组织不易搞垮；三、对聂元梓的问题要注意，不要无限上纲；四、要准备长期斗争。于是，反聂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8月17日召开了联合大会，按照洪涛的指示不叫“八·一七”，取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后来孔繁、杨克明二位老师也上了井冈山，并成为领导成员。井冈山兵团成立之时王、关、戚还未倒台，八月底王力、关峰被毛泽东抛出，随后不久，毛泽东又把戚本禹抛出，陈伯达见风驶舵，多次向聂元梓赔礼道歉，说他‘讲错了话’。

我们可以看到以聂元梓为首校文革的分裂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成立，中央文革多数成员都插了手，康生、江青、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都是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个学问大家，他熟读史书和兵书，他深知挑起下属两派互斗，互相牵制，有利于上峰控制。他的得力助手“中央文革”亲手给聂元梓及其校文革树立了一个政治反对派，反而给聂元梓扣上“派文革”的帽子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能服众的。

二、关于“武斗文革”

文革中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

（一）毛泽东、中央文革及其所控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不断向全国人民灌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路线斗争是不可

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由于亿万群众迷信和崇拜伟大领袖，都被洗了脑，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是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方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势不两立。

（二）林彪、中央文革、谢富治的挑动，制造了北大武斗。由于王、关、戚的操纵与挑动北京市高校分裂为“天派”与“地派”，各个高校内部的两派内斗，都与“天派”、“地派”里勾外联。聂、孙公开揭露吴传启，等于是对王、关、戚的宣战。因此，他们对聂元梓及北大校文革恨之入骨，他们在暗中策划，在北大校内校外，组织各种力量企图扼杀这一斗争，必欲拔去北大这颗钉子而后快。陈伯达出面搞了个“6.5”讲话，造成北大大分裂，催生了井冈山兵团。

谢富治包庇纵容 1.15 抢档案事件的主犯洪涛、刘郢，在市革委会里大量任用王、关、戚安插的亲信。在处理 4.8 民族宫事件北大和地院两派纷争时，谢富治又偏袒地院，指责北大。引起孙蓬一的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孙蓬一 4 月 12 日向吴传启团伙放了一炮。4 月 13 日谢富治的拉偏架的态度，再次让他无法忍受，在群众集会上将谢富治召集会议的情况如实公布于众，引发了一场“炮打谢富治”事件。王、关、戚一伙贼喊捉贼，借此将“聂元梓要夺谢副总理的权，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扣在聂元梓头上。¹

对王、关、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罪恶活动，毛泽东不是没有察觉。“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委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²谢富治同王、关、戚实际上是一伙的，王、关、戚垮台了，但谢富治还在执行王、关、戚的路线，对聂、孙和新北大公社继续实施打压。

1968 年 3 月在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举办的高校学习班上，出现了要求清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第 36—37 页。

² 见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第 611 页。

算王、关、戚罪行的呼声和反对谢富治的意见。中央文革心中有鬼，害怕清算王、关、戚的罪行会追责到他们身上，竟蛮横的把这些要求和意见诬为“为二月逆流翻案”，用高压手段进行打压。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本来是军队高层内部的事情，与群众组织无关。这一事件的起因扑朔迷离，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林彪讲话指责“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还一箭双雕提到了聂元梓的名字，言外之意，似乎聂元梓与杨、余、傅有什么黑关系。在这种气氛下，第二天就发生了地派多个院校上万人闯入北大校园，围攻北大广播台，企图挑起大规模流血冲突，把对北大的围剿推向了高潮。众多院校上万人，同时闯入北大，这样重大的事件，是谁组织的？谁有这种权力来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有着很深很黑的背景。有人深怕北大没有武斗，只要发生武斗，就可以将全部罪责扣到聂元梓头上，将聂元梓这根刺拔掉。¹

面对万人围剿北大，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采取了克制态度，聂元梓从北京市革委会硬是拽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命令外校学生退出北大，这才避免了一场惨祸。围剿北大阴谋未能得逞，谢富治无奈地说：“聂元梓，你真厉害！”。3月27日，江青又在北京市十万人大会上公开批聂元梓“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3.24 林彪讲话后，北京市满街刷出了大标语“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打倒杨、余、傅，横扫小爬虫”；

在北京市范围内谢富治带头大整聂元梓，并传达到社区一级，大街上刷出大标语“聂元梓滚出市革委会”、“聂元梓下台滚蛋”；

在中央文革操纵下众多高校围攻北大，企图挑起大规模流血冲突；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在校外“地派”的支持下，井冈山兵团气势大振，喊出了“打倒孙蓬一”、“聂元梓滚出市革委会”、“聂元梓下台滚蛋”、“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的口号，并“通缉孙蓬一”，围殴孙蓬一，冲击会场，武力抢夺喇叭，在此之前，还砸了“二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组”，揪斗殴打了谢甲林同志，不断制造小规模肢体冲突。3.28晚上，井冈山兵团几个纵队配合驱赶40楼新北大公社同学，占领了40楼，并抓走30余名赤手空拳的公社男同学；对井冈山这一武斗行动，公社一方于3.28深夜——3.29凌晨进行了反击，驱赶了31楼内的井冈山同学，并占领了31楼。

“3.28——3.29武斗”的发生，纯属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冲突的升级。参与武斗的两派都是极端错误的。

北大发生武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吴德在其口述回忆中说：“……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读者应该是一目了然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他老人家把全中国都搞乱了。

毛泽东一会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会又同意“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文革十六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遵照这种精神，聂元梓及校文革组织群众批判陆平时，让他坐在凳子上，允许他回答问题，结果，江青批评聂元梓“太温了”；

面对全国性的武斗形势，毛泽东虽然也强调过“要文斗”，但是，1967年9月5日，江青江青在接见安徽群众组织代表时说：“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中央办公厅随即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江青9月5日讲话。从此，各地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由支持双方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就达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胡朋池、但X‘清华7.27事件’大背景及相关大事件）从此，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工厂

停产，铁路停运，全国一片乱象。

我认为，中央文革就是各地武斗的真正挑动者和总后台。毛泽东却给聂元梓及其校文革戴上“武斗文革”的帽子，是在为自己和中央文革掩盖错误，文过饰非。

三、关于“逼供信文革”

毛泽东说，聂元梓及其校文革是“逼供信文革”，他把这顶帽子戴错了地方。

在“造反有理”口号的蛊惑下，全国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猖狂泛滥状态。一个人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几个人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根据毛泽东所划定的阶级阵线和“公安六条”的标准，一旦认为你有错误，就可以随时揪斗你，抄你的家。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对阶级敌人“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思想指导下，少数“胸怀革命激情”的红卫兵，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向着“阶级敌人”猛烈开火，他们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样子，给“阶级敌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让“敌人”下跪向毛主席认罪，不认罪就打，产生“逼供信”那是必然的。

文革中，北大在工作组领导时期，揪出了二百多名所谓“黑帮分子”（包括干部、师生），到了66年9月12日校文革成立接手时，基本上还是这个数量。在“黑帮大院”里，有个别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打、骂、虐待、逼供等；在两派群众各自揪斗所谓“黑帮分子”时，也存在殴打，逼供等现象，这都是违法行为，是极端错误的。在文革结束后进行清算时期，一些人在大会上控诉自己在校文革掌权时期遭受了非人的迫害，也有人写文章，例如：季羨林老先生的‘牛棚杂忆’，控诉自己在“老佛爷”掌权时期受到虐待和迫害。但至今没有一个人能举出实证，证明是聂元梓或校文革成员（包括分裂出去的原校文革成员）指示或授意他们去搞“逼供信”的。北大存在“逼供信”现象，聂元梓及其校

文革也难逃责任。但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狂热时期，聂元梓及校文革也是控制不了的。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我和校文革常委会虽多次开会、发通知等等，制止这种乱抓人、打人的情况，但当时学校局势我也不能控制，所以未能得到制止”。¹

1982年10月29日，在审判庭上，官派的律师季全学、史兰生两位先生为其辩护说：“监改大院”和“专案组”的问题，我们认为她应负一定责任。但是，必须指出“监改大院”以及“专案组”进行的残酷的人身迫害，并不是在聂元梓的授意或策划下进行的”。²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聂元梓及其校文革绝不是“逼供信文革”。

文化革命中，谁搞“逼供信”最厉害呢？我认为搞“逼供信”最厉害的人就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曾说过，‘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请问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口供算不算证据？

有关资料显示，“中央专案组”为了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审讯达千人以上，很多人是被专政的对象。“叛徒、内奸、工贼”三项伪证，不经过“刑讯逼供”，能拿的出来吗？

为了打倒开国元勋贺龙元帅，所谓“二月兵变”、“通敌”等伪证，不经过“刑讯逼供”，能拿的出来吗？

在“刑讯逼供”和“政治威胁利诱”面前，有的人出于种种考虑，最终屈服了，做了“伪证”。有的人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老先生，就是在穿着军装的“中央专案组”有关人员秘密谈话施压后，夫妻二人当晚自杀以示抗议。

我的结论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央专案组”是全中国大搞“逼供信”典型。而聂元梓及校文革不是北大搞‘逼供信’的幕后主使，毛泽东把‘逼供信文革’帽子戴错了地方。

四、毛泽东推卸责任，嫁祸于聂元梓

毛泽东为什么在（1969年3月24日）派出迟群、谢静宜来北大、清华之际给聂元梓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426页。

² 《聂元梓回忆录》，第390页。

戴上三顶帽子呢？实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

文化革命初期，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造反有理”的号召；他又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亿万群众又划定了造反的对象，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封资修的东西（包括文学、小说、戏曲、文艺、字画、文物，甚至庙宇等）。毛泽东唯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给出明确标准，所以，各级领导都成了“走资派”的嫌疑犯，成了造反的对象。谢富治又将这些“革命对象”扩大化，抛出了一个“公安六条”，凡是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谁议论林彪，就是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议论中央文革成员，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议论江青，就是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后来，又演化为，凡是留过学，或者有海外关系的，都有敌特嫌疑，如此等等。

在几十年宗教式愚化教育下，全党、全国人民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他是真理的化身。“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党叫干啥就敢啥”的观念已经融化在亿万群众的血液中。毛泽东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用他的话说“从八九的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戴着红袖章、手捧红宝书数以亿计的红卫兵，他（她）们象齐天大圣孙悟空抡起了金箍棒，从天堂打到地狱、从陆地打到海岛，搅得中国天昏地暗。一个小学老师都会因为所谓“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被小学生揪斗；一个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可以成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爪牙，而被揪斗；更不用说那些政治贱民和曾经大权在握的各级领导干部了。

文化革命初期，毛泽东曾“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¹。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毛泽东的“一句顶一万句”也不起作用了。文化大革命的乱势，

¹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

毛泽东已掌控不了了，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最后，只有动用军队来平息乱象，控制局势。

他面对国内乱局，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推卸责任，嫁祸于人，迁怒于聂元梓。所以给她扣上三顶帽子。

文革初，毛泽东把聂元梓当作文化革命的领头羊寄予厚望。

聂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打响了第一枪；

遵照毛泽东的旨意去上海煽风点火；

遵照他的旨意带头写了一张邓小平的大字报；

“反击二月逆流”时，聂元梓及其校文革认为保周总理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然而，毛泽东却认为“二月逆流”是中央上层一股政治势力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聂元梓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对王、关、戚的斗争，聂元梓及其校文革认为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对他忠诚的表现；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聂元梓等人是在挖坚定支持其坚定搞文化大革命政治势力的墙角，是在犯上作乱。

从1967年二月开始，毛泽东认为聂元梓离开了他所指引的“革命路线”，不再是一头温顺的领头羊，而是一头有思想、有主义的驽驴，必须抛弃。

1966年6月，聂元梓被毛泽东捧上了天；1967年2月聂元梓被毛泽东开始厌弃；1968年3月，聂元梓和北大被林彪和中央文革组织高校“地派”万人围剿；1969年，毛泽东通过谢静宜的口给聂元梓戴上了三顶帽子。虽然，九大时聂元梓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用聂元梓的话说，那是‘摆门面’，用周总理的话说，‘是工作需要’。

迟群、谢静宜执掌北大后，曾对聂元梓动过“杀机”，派出哲学系军代表魏银秋（北大党委常委）去陕西监狱诱供高云鹏，希望高云鹏做伪证，指证聂元梓是打死刘伟同学的幕后主使，高于鹏没有就范；魏银秋就蛊惑陕西高等法院杀掉高云鹏，说，‘这种顽固分子还留着有什么用？’，陕西高院没有听从他的蛊惑，后来，将高云鹏无罪释放。人们不

仅要问：迟群、谢静宜要致聂元梓和高云鹏于死地，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

迟群、谢静宜前一个阴谋未得逞，于是从1971年3月，借清查516之机，将聂元梓和孙蓬一打成“聂孙反党集团”，1973年3月1日给他们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今天看来，要把聂元梓和孙蓬一打成“反党集团”并不是临时之计，仿佛在四年前，即1967年7月上峰就有过议论。在聂树人（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叙述：‘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芳（王、关、戚的亲信、市革委会办事组长，即办公厅主任）来到地院的李贵家，与张海涛、聂树人等人见面。周谈到聂元梓——全国解放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泽东的圈子：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四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以上这些反党集团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现在，又有一个反毛泽东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字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准备有朝一日与毛泽东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¹

周景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周景芳没有这种胆量和这种见地提出“五个反毛圈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上层有过这种议论，不过这种议论把聂元梓抬得太高了。文革初期他们就把聂元梓认定为‘潜在敌人’，将在适当时期予以除之。

在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时，曾与江青、康生有过激烈的争论，陶铸认为，吴传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不能支持。康生反驳：“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在他们的眼中，聂元梓也是一个被利用的‘乌龟王八蛋’；也是一头卸了磨就可以杀掉的‘驴’。

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225-226页。

在批斗聂元梓、孙蓬一的大会上，孙蓬一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可见他们对毛泽东是何等的崇拜与痴诚？！当年新北大公社数千名干部、职工、师生，曾怀着‘毛主席支持的，我就支持’的心态，对聂元梓及校文革给予了爱护式的批评和真诚的支持，今天看来也是一场被蒙蔽、被愚弄的闹剧。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不会因“圣喻”而遮蔽，也不应“位卑言轻”去刻意隐瞒，只要揭露出历史的真相，读者自会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

2017.7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九）

——分庭抗礼

陆伟国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当然，这个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对郭影秋个人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建国后十七年各项运动及其后果的基本看法和感受的不同。特别是，“文革”前，有些教师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黑线、教育黑线、文艺黑线的过程中表现积极，自以为有了用武之地，自以为也能挤入“学术批判新生力量”的行列，却感觉没能得到郭校长更多的支持，因而对他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要讲远的话，人大干部教师之间的矛盾可溯源到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两个不同的来源，以及后来有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同背景。个中原由，就不展开讲了。

到了这时，对郭影秋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而公开否定他，在校内也不得人心。相对来说，对郭影秋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人大红卫兵”要“激进”一些，而“八一八红卫兵”要“保守”一些。这里的“激进”与“保守”，也没有褒贬之分。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不够完整和全面。在1966年的年底之前，两派的直接对抗，还比较少。在这之

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夺权斗争的兴起，各种势力愈加对立，各地群众组织间的矛盾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先是在66年秋出现了三个“司令部”，进入67年后又分为“天派”、“地派”这些。所谓“天派”是以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人大三红等等为主，所谓“地派”是以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等等为主。北京的“天派”、“地派”在政治观点上分得毫无意义，纯粹是按个别头面人物关系远近而分，和极左势力要在同一地区人为地分成两派的要求有关。“人大三红”所以划在“天派”里，是因为副校长聂真（兼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少奇前妻王前的丈夫）较早站出来支持“三红”，而聂真就是聂元梓的哥哥，这样“三红”就和聂元梓以及她的新北大往来较多，就算在“天派”里面了。“三红”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那些往来并不多。

人大校内两派的阵营也逐渐泾渭分明、对立加剧。“人大三红”，由于吸收了一部分因“八一八”解体而过来的人，力量有所扩展。原先的“八一八”则甩掉了“保守派”的帽子，改组成“新人大公社”，以新的姿态出现。正式取名是在1967年2月22日。它的第一负责人是经济系的赵桂林同学。一年半之后这位赵同学还有幸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到过。毛说，赵桂林不是反革命么。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贬斥。赵后来虽然没有被判刑、受处分，但最后结论里有句“今后不得重用”的话，所以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基层工作，连副股长也不能当。

两派的矛盾渐渐加剧，由坐不到一块儿，发展到了住不到一块儿。“新人大”往校区的北面集中，以当时的新图书馆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图书馆东楼）。而“人大三红”则主要在南面一线，以当时的新教学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教学二楼）。1965年刚建成的两个新楼，这时却派上了这个用场。住在南面的“新人大”的同学往北搬，还好说些。住在北面家属区的“三红”教职工往南搬，拖家带口，真是不易。只带着极少的用品，把家一锁，就这么走了，几个月、甚至一二年都没回去过，尽管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

这事的起因是“三红”的一些住在林园的教工宿舍受到了对方的骚扰，安全出现了问题。而后“三红”的一些学生迫使住在东风楼的“新人大”学生搬走。

等我在家过了几个月回校时，地缘政治已经改变。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本班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十多年之后，才知道是搬到新图书馆楼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就这样，我就从原来的“八一八”变成了“三红”。原地没动，却是改换了门庭。当然，无论是当初的“八一八”，还是现在的“三红”，都不需要履行任何的手续，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之间转来转去，倒是挺方便。

反正，此时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一些狭隘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有时，则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双方都没有退路，只能死拼。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错误说半个不字。在极左势力的直接插手之下，人大两派的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复杂。

“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曾几次召集人大两派成员，甚至直接来校挑动两派。如1967年3月3日凌晨，他来人大并在新饭厅发表讲话，说人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又说“人大三红”问题多一些，是“三七开”。有意思的是，他还说了我校哲学系教师肖前“是个好同志”，弄得肖老师以后成了人大两派斗争中风尖浪口上的人物（但事情本身就不再去多讲了，现在没有那个必要了）。下面引用他当时的一段原话。他说，人大革命师生的头一个敌人是孙泱，第二个敌人是郭影秋，第三个敌人是胡锡奎，这是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人物，还会有一些；另外，历史系的胡华之流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打倒。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敌人并没有打倒，孙泱的反革命气焰还很嚣张，郭影秋还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胡锡奎的问题还没怎么触动……人大阶级斗争的盖子是揭开了，但揭得很不彻底，不深不透，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人大的问题是所有高等院校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他还说，郭影秋的性质以后不管怎么定，保他都是错误的，揭他、反对他是正确的。新人大公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而人大红卫兵方面则是正确的，他们揭得很积极。但新人大公社的同志承认了错误，造了反，也就行了，不能再叫人家“保皇派”，铁杆、钢杆，应该允许人家革命嘛！同样的，“三红”在康老问题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迷失了方向，认识错误又还不够，但也不能把它一棍子打死，把它当作反革命组织，应该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人民大学的问题是所有高等学校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戚本禹的这个表态就迫使人大的两派组织要急于表现自己。在有些问题上，“人大三红”走得更远一些。比如，是“人大三红”首先上街贴了反对朱德的大字报（也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尽写些“杀猪头、煮猪头”之类的空话）。在有些问题上，则“新人大”走得更远。比如，后来对“走资派”、尤其是对孙泱的批斗更加激烈。最终，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头也都没赚到好。

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进部队了。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门槛更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而已，不像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现在所谓的“找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或只挂个名而不参与活动，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这正是当时很多人抵制极左路线的一种无奈做法。其实“逍遥派”怎么能逍遥得起来呢？常言道，“逍遥自在”，不自在何以逍遥？

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窗口，直接传

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对各地一些头面人物的相关资料，进行保留和记录。看起来像个“逍遥派”，其实不一样。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始终在冷静观察、深入思考。身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借用网上的一段话：“在这个闹剧里，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那我就是个装傻的傻子，心里还是明白的，只是不能表现出来。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个对联据说是根据毛泽东一段未发表的讲话而来的。不过，饭钱还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双方的广播站都播放过被抓过来关押着的被认为是站在对方立场的领导干部的所谓“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比如崔耀先。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

【述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三）

——军宣队默许打人

宋翔雁

一、突变与换班

时光大约是七月中旬时，一次在夜间对我的批斗和训斥中，又因说我诡辩、态度顽固而对我施暴时，我依旧专注于李某人的棍棒，竭力设法躲过他的攻击（因他下手最黑），其他人的竹竿打上就打上，我从不躲避，也绝不吭一声。因我牢记中学学习拳击时教练的教导：当你被别人击中时，无论多疼也不要吭声，一喊出来你就泄了内气，就变成挨了一记死打，而受到内伤。如你不喊就不会泄了内气，那只是表面挨打，有点疼而已，很快就会好的！所以，我每次面对他们施暴时，即使中招，也只能自认倒霉，但从不出声。而我的抗议发声，也只是在施暴停止时才进行的。

就在我专注于抵挡躲避的过程中，突然听到水塘方向连连传来极大的喊叫声，而且从声音判断，喊叫者也是男性。这让我印证了前述我曾在如厕返回时看到水塘后面有人影晃动时的判断，那边也有学习班。这让我断定，那边现在也在开始打人了，所以打人一事，绝非我的学习班所独有，它应当是学习班中普遍存在的施暴方式，而且肯定是得到军宣队认可的行为，从中可见军宣队在领导运动过程中的卑鄙和无耻。

这晚当我躺到床上时，在脑中萦绕着的不是我今天挨打的事，反而是水坑那边会是谁呢？怎样才能让他也知道挨打时不要喊叫呢？须知在这远离居民点的偏远地方，夜晚四周没有一个人，当地老表生也从来是足不出户的，你喊声再大也不可能有人听到，也不会有人知晓这里有人在施暴于人。相反，你喊声越大，自身的消耗也就越大，对自己的损害也

就越大。所以，在这种地方挨打时，喊叫既解除不了自己挨打时的苦痛，也无法给外界传递求救于人的信号。只能自己咬紧牙关，能躲就躲，能挡就挡。但思绪过后，我知道眼下我的想法是不可能传递给水塘那边的受难者的，只希望他能早点领悟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道理！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不时在夜深人静地时候，我还能听到时断时续的喊叫声，显然，那边的施暴行为毫无减少的迹象，也不亚于我这边的施暴频度，说不定比我这边更高一些！但因对我施暴时我从不喊叫，故施暴时间上下午和晚上都有发生；而那边，我仔细听过，白天基本上听不到喊叫声，痛苦的喊叫声基本上到夜晚才能听到，当然也不排除因白天外界的声音嘈杂，掩盖了那边传出的喊叫声。

大约到九月上旬，突然专案组检查我进入学习班后带来的，或后由昭明按我的要求交学习班转给我的个人用品，并将剪刀、剃须刀、水果刀、指甲刀及针线和一个塑料钱夹（钱夹内有为数不多的零用钱）等物品挑出，同时又让我交出手表、眼镜和皮带，并说上述物品暂由专案组代管，同时还问我身上有没有钱和粮票。我答道：我身上没有钱和粮票，钱都在钱夹里。并进一步问道，没有眼镜和皮带我怎能看书写字和走路？专案组人答道：需要时自会给你。对专案组当时的这些举动，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的用意何在？但稍事冷静思考后，我即明白此举是因怕我自杀和逃跑而作的防范。但为何此时会促使专案组采取这一措施，当时我并未去想。直到当我被解除隔离后，方知水塘后面就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的学习班，在专案人员不断施暴的情况下，他伺机出逃，进入深山后，上吊自杀。

据称当李出逃一事发生后，开始并未发现李的尸体，故军宣队一直按在逃定案。故一面派出多批人马去相关部门、地区和李明哲老师父母家里调查、寻访，力图将李擒拿归案；一面就是对其他被隔离对象加强看管力度，防止再次发生出逃事件，此乃我被突然检查个人用品及收缴有关物品和钱、粮票的直接原因。

可以肯定地说，李明哲老师是被其专案组成员残酷迫害而身亡的。我虽不是直接目睹

者，但我却是在专案人员夜晚施暴过程中，直接无数次听到李明哲老师悲惨呼叫声的见证人。李明哲老师的死亡是军宣队和专案组人员尤其是李明哲专案组成员，在地院抓“五一六”运动中犯下的杀人血案！这起案件不应被淡化，更不能被遗忘。此事已过去36载，涉案人员不仅理应深刻反思自己对李明哲老师的迫害之罪，以谢亡灵、净化自己的灵魂。更应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这段罔顾国法、违背政策，打着红旗反红旗恣意妄为的罪恶历史，以及军宣队和专案领导班子在这起案件中不可推卸的罪责。我们大家有责任让这段血淋淋的草菅人命的历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地院的所有师生员工永远铭记。尽管我与李明哲老师并不相识，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说过一句话。我只是在文革初期反工作组时，方才知晓其名和所在单位。但行文至此，面对这一悲惨事件的主角李明哲老师，满目含泪的我诚心实意地向他表达我的哀悼和敬意。他虽被说成是自杀身亡，但他却是一名以血溅轩辕的方式，以身死相抗争的一名战士。他不惜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告诫国人：伟大领袖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罔顾国法、践踏人性、涂炭生灵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血腥整人运动。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责任奋起声讨文革的罪恶历史，以此悼念亡者，警醒后人！

随着专案组人员完成对我私人用品的清查和收缴后，对我的管束也更加严厉，如每次申请如厕大便时，一度均改为由两人看押，而且返回驻地时，经常喝斥不允许我四处张望并催促快行。此外，每当我申请剃须要求发还剃须用具时都一再拖延。每当我用专用皮带磨锐剃须刀片和剃须时，均一直有人在旁看守，而且一旦剃须结束，专案人员就立即将我的剃须刀具和磨锐皮带收缴回去（因我使用的是英国四十年代出产的VANLET剃须刀具，刀片可在刀架上借助配套的磨锐皮带进行磨锐。因当时国内市场已早无此类民用消费品进口，故我只能继续用手中留存的那些VANLET刀片，反复磨锐后使用）。此外就是施虐情况更甚，特别是频繁使用疲劳战术，经常每晚十一点以后让我听训或对我进行批判，而且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个别有时甚至会达三四个小时之久（因这时我的手表已被收缴，具体的时间以及每天我能睡几个小时的觉都只能是估计）。进行疲劳战的施虐者们，其卑鄙、恶劣之

处在于，不仅他们自身的作息时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行安排，以保证他们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他们采用的是轮流施虐制，每次施训就两人参与，下次施训又换为另外两人进行。因此，施虐者总是精气神十足地对我训话呵斥，而每当我因晒倦难熬站立不稳时，他们就会动粗施暴，用其手中的竹竿打人。我则因晒倦早已失去反应和躲避的能力，只能承受竹竿的击打了（此时专案组成员都改为用粗细不等的竹竿行凶了）。不管专案组的夜晚训话何时结束，也不管我几点“上”床就寝，但到凌晨六时左右，我就会被专案组成员呵斥叫醒，而且在喊叫的过程中，不时还会用脚踢我的腰胯部，借机施暴（因当时我的床板就直接放在地面，施暴者以踢人的方式喊人起床，更为方便），这种施暴方式，在连续数晚的训斥中，几乎已成了惯常现象。所以为了预防施暴者脚踢时可能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因缺觉，清晨六时许，我正处于熟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遇袭时，往往会加重受到伤害的程度），我睡觉前都会仔细将脱下来的衣裤叠好，置于被子内腰胯部位面对床铺外侧的一面，以减轻被踢的力度（因此时已进入十月，晚间和凌晨的气温已经较低，故睡觉时衣裤盖在身上也极其自然，不致受到怀疑）。但我也想指出一点，即在收缴了我的部分个人用品后，尽管施暴打人的现象依然频频发生，但似乎打人的烈度有所收敛，使用木棒狠打的情景基本上没再出现，而且夜晚也再未听到过来自水塘后面的喊叫声（因当时我并不知道李明哲老师已出逃并故去）。故当时我认为军宣队把暴力施压为主，改变为暴虐施压为主，在不致造成被囚者身体外表受伤的情况下，却会给被囚者内在的身心健康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可谓更加阴损！

时间已拖至约七一年十月中上旬，我的问题仍僵持着毫无进展。一日，专案组成员主动让我搞搞个人卫生，换衣服、刮胡须，并交还了我的眼镜，然后告诉我军宣队要找我去校部谈话。当我一切准备停当后，行前杜某又对我训话道：这次军宣队领导找你谈话是很重要的事，你要仔细听好。此外，沿路你要很好听从指挥，不许东张西望。不管路上遇到什么人，都不许与别人说话或打招呼。言毕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方才带我出门，并朝龙陂的方向走去。这是我被押解到长田近半年后第一次“出门”远行，但我却丝毫没有半点

兴奋的感觉，而且也没有观看自然风光景色、陶冶于大自然中的闲情逸致。这倒不是因为杜某人事前不许东张西望训诫的威力使然，而是由于此时我全神关注和思索的是军宣队这次找我谈话的原因和目的何在？以便能找到适当的应变措施。须知这是我被隔离近一年后，军宣队第一次主动找我谈话，尽管此前我曾多次因专案组施暴、施虐要求面见军宣队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渺无回音。因被押往长田后，很快我的问题就形同死结而毫无进展，无论如何批斗、施压、施虐、施暴，我的回答始终如一（除东方红公社外，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从时间节点、我的身份和我身体的状况分析，很容易加以判别）；我的态度也始终如一（因有人揭发把水搅浑，我相信组织，愿意积极配合调查。为搞清真伪，我愿意和揭发人当面对质）。面对此情难道军宣队萌生解开死结的新打算？抑或是再次发出哀地美敦书，给出期限，限时承认交代，否则到时即刻结案宣判，并转至专政机关处理？沿途这两种想法交替在脑海里回旋，始终难于得到确定的结论。眼看即将到达校部，我停止了内心不着边际的思考，给自己定下了应当遵循的下述原则：即一直以来确定的态度、底线不变；认真仔细听取军宣队言谈的中每句话、每个字的含义；慎思而谨言，不明了的地方，应直接询问清楚绝不主观推断。需要考虑方能回答的问题，以需要回忆或思考为由，要求给时间想清楚后再作回答。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应对原则后，我的心情也就稳定下来，在案专案组人员引领下，从容地走进了“学九楼”军宣队的驻地。

当我步入军宣队办公室后，发现室内共有四名军人，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可能又加强了军宣队的领导，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但不容我多想，蒋喜亭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语气和缓地说道：宋翔雁，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你可以坐下来听我慢慢说，并指指我身边的凳子。当我坐下后，他也坐下来并继续说道：你的学习班已经办了快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院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多“五一六”分子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交了自己的问题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原谅，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了。但你却和他们相反，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这样做是很可怕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尽管如此，但我们遵照党的一贯教导，还是

不愿放弃对你的帮助和挽救，不愿意眼看着你滑向反革命的深渊。今天找你来谈话也是我们不愿放弃的一种表现。同时，我也想告诉你，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已决定地质学院今后要迁至湖北省重新建校，故学校今后将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军区领导，我们将在交接工作完成后撤回北京。今天在座的这两位同志就是湖北省军区派来接替我们工作的（当时蒋指了指身边坐着的另两位解放军同志并说了他们的名字），为了让他们了解你的情况，所以请他们来共同和你谈话。

应当说，蒋的这段开场白其语气之平和、态度之诚恳，是六八年军宣队进院以来在我印象中的首次。从他的开场白中也使我知晓了这次谈话实质上是京鄂双方就干校工作进行交接的一部分，而从抓“五一六”运动而言，无疑我的问题又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毕竟隔离时间已将近一年，其中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势必要给接手的一方有个交代。因蒋的谈话仍在继续，故我只好暂时停下自己的思考，专心于听他的讲话。他继续谈道地院抓“五一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说从院到系革委会的各级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均被“五一六”分子所把持，地质学院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被他们所篡夺。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贾振远、陆炎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现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众多跟随他们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不仅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反戈一击揭露出大量在院内外从事的反总理活动。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好形势，在学习班中，专案组已向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了，对此你应当是了解的，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讲了。你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面对军宣队心平气和地讲出想听听我的想法，这在近一年的隔离审查中还是第一次。这种平和对等的气氛，给人一种新意，让我觉得是一个能够相互沟通，解开依然处于死结状态的问题机会。于是我稍作考虑后说道：我的学习班办了已快一年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也想不通。刚说到此蒋喜亭就打断我的话，但仍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有问题想不通就说出来，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疑惑和问题，当疑惑解决后，你的问题也就自然能

很快得到解决了。这时，我从他的面部表情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得意与自信，似乎他真的认为把我的问题拿下，就在这一瞬间了！他继续说道：有什么疑惑今天你就都说出来吧，相信我们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于是我继续说道：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中央文件说了“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这个组织的人数就不会很多，而且其成员和组织的活动肯定也是很诡秘的。但为何地院里面却有那么多的“五一六”分子，这岂不比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公开了嘛？说到这里，本来我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何不仅上层领导班子里有“五一六”，而且中下层领导班子里也有，甚至连一般老百姓中都有，这样的组织还能隐瞒很深吗？

不等我再发问，蒋喜亭就噌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彻底抛弃了他那伪善的一面，露出了原本的狰狞面目，大怒地对我吼道：滚！真是不可救药。面对蒋的这种无理谩骂，我鄙视其到了极点。我毫不迟疑的站起来，转身拉开屋门就跨步走出了房间。因事发突然，专案组成员赶出来时，我正沿过道向“学九楼”出口端走去。专案组成员一看急了，大声喊道：宋翔雁你站住！我无所畏惧地回应道：我在过道出口处等你们，我不会跑！我心想，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居然如此没有修养和水平，这实出人意料。想想几分钟前，面对其伪善的开场白，我还幻想着能与之沟通以便解开问题的死结，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须知，军宣队所执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路线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方针是不会改弦更张的。

等专案组的人在“学九楼”出口赶上我后，我们又稍等了片刻才踏上返回长田的归途。沿途我只是默默地走着，毫无心思观看路边的农田景色，也没有心思去思考实现换班后，新的军宣队领导将会如何处理我的问题。这时的我，头脑中似乎一片空白。但我也觉得，让自己能借机放松一下也好，毕竟古人言：有张有弛乃文武之道也！今听从之或许也是有益的。回到驻地当我进入自己的囚室后，专案组的人并未责令我该做什么，锁好屋门就退到室外去了。显然，我估计他们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也颇感意外。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在他

们认为将会有的一场重要的谈话，竟会以他们的领导蒋先生的一个“滚”字而胎死腹中。因此，眼下也就暂时失去了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我的问题的依据。所以，他们需要等待新的指示。

经过回程时的短暂放松后，在囚室内的我，珍惜这难得的无人干扰的宁静。我重新回顾了上午蒋某人的所言和我的对答，同时也极力地回顾着湖北省军区军宣队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的情况。我力图从中发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动向。经过记忆的梳理，让我得出了以下的看法：

1. 蒋企图通过这种交接方式，给接手的湖北军区军代表一种他们在对待尚未交代的“五一六”分子，一直是按照党的政策，耐心教育以等待他们觉悟。同时，对他们在隔离审查期间的生活也是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按革命人道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这一切均可从他的开场白的语调和所流露出来对被隔离人的关心，以及我来前的个人清理换装后的外表得到证明。但假的就是假的，一旦当我提出的问题、疑问令他难以自圆其说时，其暴怒时喊出的“滚”字，就将其原本凶狠、胡来的极左面目暴露无遗了。这也使我更加鄙视蒋某人虚伪和两面派嘴脸；

2. 我的提问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是切中了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关键之处，否则蒋某也不可能情绪失控到如此不顾脸面的程度。通过我提出的问题和冷眼面对蒋某的怒吼并傲然离开的举动，也向湖北军宣队表明了我不惧强权但却是说理的态度。无疑这对湖北军宣队在接手我的问题时，对蒋某及专案组所言的内容和材料多少会产生些许影响，对避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也许能有些微弱的好处。当然我也清楚，北京、湖北的军宣队所接受的都是来自北京中央的指示的，故不可轻易认为湖北军宣队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和先入为主的覆辙，搞不好，甚至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呢。总之，还是老话一句，凡事不能只想好的可能性，这会让自己心存侥幸而麻痹；3、在蒋某讲话、怒吼和我提问、出走的整个过程中，湖北军宣队的两名成员，毫无表情且一言未发，显得相当沉稳，所以在今后的审查中自己需要更加谨慎对待。

军宣队交接时的谈话因蒋某人的发怒而夭折后，专案组成员有两三天没有对我训话和找茬儿。但好景不长，随之对我的管束就又恢复了常态，继续以夜间听训、审问的方式搞疲劳战术。

因晒倦头脑发木，他们说什么和问什么实际上我完全听不进去，但这时有一点我是极其警醒的——在木讷和困倦的情况下，绝不回答任何问题，以免发生错误。因此，每当我困的难熬而又让我回答问题时，我就用：我太困了，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来搪塞！尽管这样往往会遭到施暴的竹竿伺候，但我总觉得比说错了话要好得多。加之此时天已渐寒，衣裤也穿得比以前多些，在不是特重的击打下，还不至于出大的问题。但因长期缺觉，体力消耗极大，终于在一次夜间训话施暴中，在一次击打后倒地不起。专案组成员再骂再踢我也没有起身，但头脑还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困倦而无力，并非因挨打受伤所致（因浑身并无太大的疼痛）。故我也就势装死躺着，当有人弯腰问我：你装是吧？快起来。我含混地说道：太困了，我真起不来了。

面对此景，他们也只好作罢，让我去睡了。但我还恍惚地听到有人不解气地说道：这算便宜他了！由此可以看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己任的年代，有些人的心已经被狗吃掉了，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的人性已渐渐为狼性所取代，这也正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可怖之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今人警醒了！

二、广播与智斗

时光大约已进入十一月上旬，我的问题仍毫无进展。我心想，看来湖北的军宣队依旧继承了前军宣队的衣钵，并沿用着前一段的管束方法，以施虐为主迫我就范。当然，我也想到过可能因接手后头绪很多，还很难就我的问题仔细进行研究，故只好维持原有做法，待腾出手后再予以研究解决。因此，我告诫自己，我的问题可能还需假以时日，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还需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可心急而乱了方寸。而正在此时，我隐隐约约

的从村里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熟悉的音乐声——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一连几天连续播放着。对此开始我并未在意，但连续两三天来均如此播放，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到长田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此间我从未听到过农村广播发声，而现在听到了播音，但播出的既非公社的通知一类；也非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转播，而是一个劲的连续播放同一首语录歌曲。这绝对是一个异常情况，但问题并非出在公社广播站，肯定是省或中央要通过这首歌曲传递某种声音。我继续专心致志地听着播音，几乎一周有余，都是同一首歌曲连播约十分钟左右，而且中间没有话语播出（当然也不排除我没有听见话语播放，因声音很小，加之可能因风向影响，声音时断时续，致使我难于听到）。反复思索后，我只是觉得有异常，但无法找到答案。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现象来保护自己，免受专案组施暴的危害。

有了这一想法后，在一次夜晚听训中，当专案组成员再次用竹竿打人时，我毫不迟疑地对杜某厉声说道：杜展凯，你纵容手下不断打人不觉得可耻吗？现在广播里天天都在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吗？你们这样做那点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那点符合党的政策？面对我的严词质问，杜某等人先是一愣（他们可能怀疑我是从哪听到广播的），接着又是李鹤忠搬出了他那套放下武器的才叫俘虏，你不交代就表明你没有放下武器而不在此列那套混蛋逻辑来反驳，并且还想继续挥杆打人。但我毫无畏惧地对李某说道：李鹤忠，你好好学学。毛主席说的是“不打人骂人”、“不虐待俘虏”，你现在是不是又想打人？“俘虏”指的就是被抓住的人，你们为何要虐待被抓的人呢？

面对我的质问，他们在一愣之后确实无言以对了（加之他们当时可能已经听到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事件的传达，但这只是我后来的揣测，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因此，他们不再回答我的质问，并草草结束了当晚的训话。事后，尽管我为自己能以广播讯息作武器，来保护自己很感满意，但我并未停留在抗争小有成功的兴奋上，令我关注的仍然是，究竟是何原因要反复播放主席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语录歌曲。但处于隔离状态下的我，仅凭极其有限的政治阅历，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点子上的，能

想到必有原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这点倒并非自夸！

经过这次据理抗争之后，专案组持竹杆打人的施暴行为是明显减少了，尽管不时在训话时还要手握竹竿在一旁摆弄，但却极少真正挥杆打人。这也许是他们为了摆出样子，不肯认输的一种阿 Q 精神流露吧！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眼看七零年即将过去之时，我的身体状况似乎出现一些异常。夜晚睡觉时，有时会因左腿疼痛而醒来，但疼痛的部位却很难定位，自己起来搓揉时也不觉有何异常。但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在白天如厕时，在仅有 30 余米的路上，竟会走着走着而突然跌倒在地，而跌倒前并不觉得有身子晃动、站立不稳的情况出现。这种无缘无故的跌倒现象，从出现到我离开长田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五六次之多，几乎都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点专案组监护我去厕所的成员看得也很清楚。

为此，我曾向杜某正式提出就医的要求，也向他说明了我夜间被疼醒和我起来揉搓的情况（因夜晚囚室里仅我一人，我起身揉搓这些情况专案组成员并不知情）。但杜某却打官腔地回答道：这需请示军宣队领导后再定。结果如石沉大海，将近一个月都无人答复。直至长田关押学习班改由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赵壁媛亲自挂帅，学习班转入攻心阶段后，才爽快答应并派一新调入校医室的中医大夫（名字忘记，只知道她是我们半工半读教研室物理老师张待勉的爱人）来长田，作为医生的她看得出为人很正直，她并未因我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而漫不经心，相反她为我做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检查。查后她对我说道（当着专案组成员的面）：你这是因潮湿寒冷引起的气血不通所致的病患，现在看来你足背的静脉搏动较弱，气血不流畅，需要注意保暖。目前校医室没有什么对症药物，还需你自己注意，晚上睡前最好用温热水泡泡脚，这会有所缓解（事后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因长田学习班的施虐后果，导致我左腿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后来由北京宣武中医医院确诊的）。

三、妻子的回忆：从苦熬到“顺从”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我带孩子来干校已快一年了。尽管我在菜班的劳动强度较大，回家后还需尽心地照看好孩子，因为，儿子不仅是我和翔雁未来生活中的寄托，他更是我们未来人生的憧憬和希望。所以，当翔雁被隔离后，不管在干校我多累、多苦，但对儿子的照料、饮食、衣着、教育和呵护，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尽心竭力地去做，力争做到最好。而每每看到儿子欢快、健康的身影时，一股幸福、温馨的暖流就会回荡在我的心田，而这正是翔雁不在我身边时，让我驱离孤独困扰的特效灵丹妙药。

大约十月中旬，当时刮风时已颇觉凉意，而我们在劳动中汗流夹背的情况是经常的，因我没太在意，加之这么长时间的劳累使身体的抵抗力有所下降，导致我终于因感冒病倒了。浑身酸痛乏力，体温较高达 38.6℃。在校医室就诊后虽服了药，但体温始终降不下来，反而继续升高达到 39.4℃，这时我头也有些晕眩，但我没有权利躺下休息，还必须咬牙蹒跚着带着孩子去锅炉房和食堂，打水、买饭。但此时我再也没有体力背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我只能一手提着分为五隔的饭盒，一手拎着两个五磅的暖壶，让刚两岁十个月的孩子牵着我的围裙，跟在我身边慢慢地往前走着。这段过去我背着孩子五六分钟就能走完的路，如今我们娘俩竟需要走十几分钟。而此时看到我如此狼狈的人们，多数人都因我是“五一六”家属而熟视无睹擦肩而过。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只要他们不风言风语的议论几句连损带挖苦的话语，我就很感庆幸了。

记得此前，大约还是夏天时，各家几乎都坐在屋/棚外乘凉、干点家务或闲聊，此时住在我们同一排东边的朱定宇老师的夫人程爱霞，就带着讥讽的腔调对他人大声地隔空喊话道：也不知宋翔雁现在情况怎样了，有啥好坚持的，真要当殉葬品不成？对她如此幸灾乐祸的挑逗，我真的不屑一顾，而且通过她几次类似的言语，也让我深知其做人的品行了。后来只见朱定宇老师立即出来将程某拉回屋内，朱老师因其母被划为右派的遭遇，胆小怕事，从不介入政治，这点我很清楚。而且他本人也是正直、善良之辈，不会干出落井下石

之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朱老师都是十分尊敬的。但毕竟我的不幸和当时的狼狈相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善意同情，尽管他们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做得更多，但他们纷纷让我打水、买饭不用排队的举动，就令我不胜感激了！善良、同情心，本来就是人类繁衍和完善自身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行之一，但在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的文革年代里，它却从很多人的心灵中泯灭了，至今我们的社会还在为此付出令人痛心的代价！

当我的体温已经升高到 39.6℃时，我开始有些担心了。我害怕万一有啥变故时，幼小的儿子咋办，谁来照顾他呢？！在这种情况下，立即退烧已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这时，我从床上爬起来，找出我珍藏的“百宝盒”，取出了离京前母亲交给我她老人家已保存了几十年的退烧良药羚羊角，以及老人用颤抖的手抄写下来的使用方法。见物生情，此时老人家的话语和举止，就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从脑海里闪过。

当时，老人家把小包打开，拿出了已保存很久的羚羊角说道：你把这个带上，到乡下有用。万一孩子发高烧久热不退时，你可刮下少许羚羊角粉，用温水让孩子服下，很快高热就会退下，这样就能给后边的治疗赢得时间。记住，男孩子的用量绝对不能多，否则会影响男孩生育功能的。并且还说道：小益（我侄子）现在已经大了，而且北京的条件比乡下好，你带着去，是保命的药，一定要保管好。这药还是解放前我怕你们万一出事买的呢，现在药房里根本没货，有咱们也买不着，千万别丢了！随着这一幕幕情景的闪过，我的泪水就像启了闸的洪水一样，呼啦一下流了下来。我妈为了她的外孙，把最坏的情况都替我想到了，离京时她一点也没有谈到自己，想的却是我和她的外孙。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庆幸，我也为自己不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孝而感到愧疚。我收住了不断涌出的泪水，不敢怠慢赶紧找出翔雁的工具箱，取出一把三角锉，用酒精搽洗后，从羚羊角上锉下一些粉末留存在一个小盘中。然后我又倒入一些温开水，连同羚羊角粉一起吞下。服过药后，我收拾好东西和羚羊角，又喝了一大杯水，就和衣而卧再压上被子躺在儿子身边睡着了。

经过一夜的沉睡，醒来时天已大亮，起来后我觉着身子轻松很多，赶紧量量体温，发现体温已接近正常（37.9℃），我太高兴了，一颗绷得很紧心弦，顿时放松下来。这时，我先喝了一大杯水，服下了校医室给的药。我看着睡的正香儿子，赶紧为他准备早起要喝的牛奶。我知道羚羊角只能起到降低高热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正常的检查和治疗。因此，我还得去校医室继续检查诊治，继续服用当服的药品，否则将会前功尽弃的。经过校医室的检查和继续服药，第三天我的感冒终于接近痊愈了。但令我不安的是儿子这时的情况似乎有异，食欲不佳，连他每天最喜欢喝的牛奶，也只喝了不到平时的一半，尽管体温还基本正常，但我估计很可能已经被我的感冒传上了。我赶紧带他去校医室查看，大夫说是感冒初起，给了些药。但孩子的病情发展很快，到夜晚时，体温已升至 38.7℃。我又给他服了校医室拿的药，并喝了大量的水。但直到清晨他的体温已达 40.1℃，我赶紧抱孩子去校医室，大夫检查后没有发现其他症状，让继续服药，并又给打了退烧针。回家后，看着孩子的高烧始终不退，内心极为焦灼，我决定若下午孩子体温仍在 40℃左右时，还是应当给他服一点羚羊角为好。于是我又取出了收好的羚羊角，给孩子锉下一些羚羊角粉末，准备需要时服用。大约下午二时，给孩子量体温仍然是 40.1℃，打退烧针后孩子体温丝毫没有一点降低。于是我立即给孩子喂服了羚羊角粉，并继续观察他的体温的变化。当孩子躺下后，可能因高烧很快就睡着了，趁此机会我赶紧拎着暖壶想急速去锅炉处打水。但因我自己的感冒还尚未愈痊，加上孩子生病后精神紧张休息不好，所以两腿疲软，走路时身子都晃来晃去，哪里还能快速前往呢。在锅炉处等着打水时，王彦（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守成的妻子，后来二人离婚）看我脸色不好，十分关心地问道：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对王的关切问话，我先是一愣，因自翔雁被隔离后，难得有人会关心问起我脸色的好坏，此外，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也无交往，只是均知道彼此都是地院的职工，碰面时相互点个头而已。今天听到她关心的询问，确实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如实的告诉她我和孩子都感冒了，我虽已快好了，但孩子还正发高烧呢。她接着说道：你一人带着孩子还得干活，真的很不容易。我建议你孩子送出去请别人帮带，自己的身体要紧呀。并说，如果你愿意，我可

以给你介绍一个人，她人很好带孩子也很有经验，曾给地院很多人带过孩子。我感谢了她的关照，并告知，因孩子现正发高烧，下一步怎么办，需等孩子烧退后身体情况稳定下来再说。如果需要，届时我再找她，请她牵线帮忙。因我怕孩子醒来后家中无人，我匆匆与她告辞赶回家中。王彦本人是十七级干部，但在学校里具体做何工作我却毫无所知。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她未因翔雁正被隔离审查怕沾包而歧视我，相反我还给以关切和叮嘱，从中可以看出她为人善良的一面，至今回忆起来还是让我十分动情的。

孩子这次感冒经历了大约一周才好，在此期间我思前想后，觉得王彦的建议值得考虑，但因此前有朱师傅家人帮带时的教训，我想先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后再定。所以我先向菜班的头头徐忠打听到王彦的住处（政治教研室的老师和王彦都比较熟），后找到王谈了我的想法和顾虑，王对我的顾虑表示理解，她向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卢大妈的情况，并还介绍了她帮过的几家人，建议我可以找他们再作些了解，一旦有托带意向时，她可以托人捎信让卢大妈来龙陂与我面谈（卢大妈家住在仁和镇）。基于王讲的几个人都是干部，我与他们都不熟悉，加之我当时的处境，怕给别人带去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对王说道：感谢您的认真，我相信您对人的判断。现在我真的没那份精力再去打听，请您先约她来龙陂，我们先见面谈谈，合适就可以定下来了。在王彦的帮助下，我与卢大妈见面后很快就定下来，请她帮我带一个月的孩子，月酬30元（不含奶粉、鸡蛋、糖、肉等费用），一个月后，再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托带。因此，干校托儿所这边我也不敢立即退出，托儿费每月仍需交付。

大约十月底，孩子和我的感冒均已痊愈，只是经过这次高烧的煎熬后，孩子的身体还显得有些虚，不像感冒前那么敦实。但考虑到我自己的身体情况，确实再这样挺着，很可能会一下子垮下来，到时就不好办了。所以，从十一月起，我就将儿子送去仁和卢大妈处，请她帮忙照料，希望能给我一个月的调整时间。因仁和距龙陂还有一段距离，万一有事要联系并不是很方便的，单程步行也需四十多分钟，慢走需一个小时左右。所以送孩子过去时，还给他带了点羚羊角粉，以防万一，并告诉了卢大妈的用法，请她注意保管。但没想

到此事后来会给我带来一些不愉快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到年底或七二年年初时，菜班徐忠突然对我说：政治教研室吴××老师（他们两口子都是归国华侨）的孩子高烧不退，你能不能给她一点羚羊角救救急？！闻后我大吃一惊，想必是卢大妈告知于他的，因我从未和其他任何人讲过我有羚羊角的事。当时这事如何应对确实让我十分为难，因为这是我妈留给外孙的急救用药，而且总量不多，仅仅不足一个拇指长的羚羊角身，外加一粒蚕豆粒大小的羚羊角尖。加之我现今的处境还会持续多久，心中也毫不知晓，怎敢贸然倾囊相助，尽管古人有救人一命胜似七级浮屠的说法，而今人又有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之说。但我思考良久，觉得留下骂名也罢，我无法应景高攀，没有那样高的风格和觉悟，得罪人就得罪人吧，故断然回绝了徐忠的要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有一些借慷他人之慨的手段，彰显自己以助人为己任，谋取声誉的人在，对此我一直都是有看法、有保留的。

事后我问过卢大妈，她没有否认是她告诉的吴老师，因她曾带过那个孩子，得知她发高烧时，想到我有羚羊角就告诉她了。对此我没有再说什么，因她也是出于关心她曾带过的孩子，但我也直言不讳的告诉她我无法帮她的原因。到月底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加之孩子不在身边，我总不踏实，精神放松不下来，因此决定还是把孩子接回来，平时送托儿所为好。故我到干校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带到仁和送给卢大妈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当我整理孩子的东西准备一同带回时，问到她我给留下备用的羚羊角粉时，她说道：因没放好，叫孩子给碰到地上全撒了。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是有意留下来准备给她外孙女用的。

由此也可看出，人的私心、私欲即使在那个成天讲政治，成天喊阶级斗争的年代也是无法真正清除的，只会让其以更为隐蔽的、或借助某些合法外衣的形式堂而皇之的留存下来。所以说，毛林等在文革期间大力鼓噪的“大公无私”说教，实乃是一种梦幻的乌托邦式说教罢了。■

【读者来信】

1. 肃水：蔡鸣乔的文章有深度

在北京高校老五届反思文革的文章中，北师大蔡鸣乔先生是最诚恳，最有深度的。他在《记忆》193期上发表的《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一文，是近年来难得的好文章。我偶然读到它，为作者的诚挚和善良，更为他那有深度的思考所感动。我把我的感想和这一期《记忆》转给了多位大学同窗。他们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希望那些至今仍为派性打笔仗的人们读一读此文。■

2. 宫香政：190期读后感

我看了一下190期上唐利、舒声、俞小平等人的文章，感觉他们的派性太足了。他们用文革中打笔墨官司的手法来反驳别人。例如：抢先抓住一个政治口号‘文革思维’，尔后把它强加在对方身上，进行批判。他把胡拾音所披露的历史事实，视为‘文革思维’。我认为，书写北大文革史，许多重大史实绕不过去：

一、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和‘516通知’的关系；

二、校文革的产生与分裂以及北大公社产生，剥离不了与毛泽东、中央文革、谢富治等人的关系，同样井冈山兵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剥离不了与中央文革和王、关、戚等人的关系；

三、北大武斗大事件双方都应该出面写清楚；

四、迟、谢对北大知识分子的镇压及其背景；

五、文革后的清算；

六、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现在频繁发表文章的舒声等人，他们是井冈山普通成员，对内部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否认一些事实真相，象‘阿Q’一样怕别人提及有损于他们组织形象的任何史实。唐

利觉得前面的话语太片面，后面又改口说，‘当然，文革回忆没有禁区，任何的课题都可以讨论，搞清史实’。他究竟是想‘搞清史实’还是不想‘搞清史实’，让读者一头雾水。

舒声等人又提出一个政治口号‘为文革翻案’。以我的理解，为文革翻案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是为文革唱赞歌，象戚本禹那样；二是对在文革中所有的犯罪行为不认错；三是否认历史事实，为自己或本派做派性辩解。

我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言论，进行质疑，对邓小平清算红卫兵，将‘党内斗争刑事化’的错误做法，进行质疑，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这与‘为文革翻案’划不上等号。

化名舒声的张从在文章中，质问谢甲林同志为什么没有保护好翦伯赞他。对翦伯赞之死，一些校友在《燕园风云录》中已做了详细披露，作为此书的主编之一的张从对此应该是清楚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把翦伯赞视为座上宾，称之为“红色历史学家”，文革中他变了调，说是北大有两个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翦伯赞，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冯友兰。翦伯赞是在工、军宣队进校后，在中共中央专案组有关人员施加政治压力后，当晚，夫妻二人以自杀表示抗议。请问张从：谢甲林同志确是受周总理之命保护六位重点人物的安全的，但是，谢甲林能够阻止毛泽东变调吗？他能够阻止中央专案组的行动吗？

文革结束后，经过邓小平和彭真对北大的清算（等于北大社教翻了两次烧饼），原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已成为‘弱势群体’，已经无语了，许多人不愿意再提及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那段被欺骗、被愚弄、酸痛无奈的历史了。五十年后的今天，为了书写北大文革史，有些同志披露了一些重要史实，结果张从、唐利等人关于“文革思维”、“为文革翻案”等说法，是对不同意见的打压。

事实上，张从等人把井冈山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内斗视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正是“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不可调和的”翻版，就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思维”。

我自知我的文笔水平有限，但我始终用事实来写文章，捞干的不搞虚的。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错误之处请大胆指正，决不会有抵触情绪。■

2017.8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夏 青